

夜闌了 從格坦斯克湧起來的青春熱血，又俯伏在坦克的陰影下。即使分明是一次悲劇，我們也需要毫不猶豫地要聲援和宣頌這羣挫敗了的英雄。

血，是殘酷、野獸的象徵，象徵著肉體上、心靈上的摧殘。波蘭軍管鎮壓不僅奪去了革命者的自由，甚至生命，而且企圖把人民心靈裏的希望輾碎：

血，也是生命、熱力的象徵，象徵著向前革新的動力和犧牲。基督教訓我們：死亡不就是死亡，死亡緊接著復活。團結工會社會運動，正好把波蘭熔化成充滿生命、活力的血泊。我們以熱烈的期望和「冷靜」的筆觸，撫摸血泊中的波蘭。

「波蘭仍未滅亡……」。這是波蘭國歌的頭一句：革新的動力，這動力的社會基礎，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在波蘭、東歐，以至全世界，正在日夜滋生：我們需要認識和投入這時代的啓示中。這些啓示，正重複地許諾著革命新天地的來臨。

福
天
應
存

6

十二

目錄

序言	1
	6
1. 波蘭工運的歷程	12
2. 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團結工會	17
3. 波蘭階級分析	22
4. 糟糕的波蘭經濟	25
5. 社會主義神話下的危機	31
6. 掙扎——社會主義與現行之社會主義國家	39
7. 波蘭經濟改革與管理自主化	43
8. 波蘭八部——政治經濟分析	57
9. 教會在波蘭	66
10. 軍管下的波蘭，教會可否有更積極的角色	73
11. 波蘭傳播媒介的鬥爭	91
12. 香港報章裏的波蘭事件	

由工會運動到軍事鎮壓

序言：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蘭的共黨執政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拘捕了成千在格坦斯克舉行會議的團結工會領袖。行動結束後便宣佈成立軍事委員會，實行軍法統治，暫時壓止了八零年以來蔓延全國的工會運動。

對於這次事件，本港的報刊雖曾有過不少報導，甚至是評論，但對於事件涉及的有關問題的討論則極之缺乏。就以波共當局為甚麼選擇在團結工會成立一年多之後才施行暴力鎮壓的問題為例，一般只是認為團結工會過於激進，策略上失了調節，其次便是說蘇聯的壓力越來越大，波共為了向老大哥交待，迫不得已孤注一擲。這些見解都只是一些想當然的見解，完全沒有切實考察和分析團結工會成立以來的局勢發展。

此外，對波蘭的經濟問題的評論也往往流於表面。一般只是將問題籠統歸咎於共產制度，造成經濟困難的具體原因則一概忽視。

這部冊子是由參加〈曙暉〉工作的同學（〈曙暉〉乃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刊物）經過個多月來的學習和討論後寫成，對問題的討論雖然還不很成熟，但是各篇文章所論涉及波蘭的歷史、經濟環境、經濟改革、工會運動、教會角色、社會性質、階級分析、社會主義前景等，讀者可以了解到波蘭經濟的具體問題和促成團結工會成立的特殊歷史、政治因素。

這裡特別交待由團結工會成立到實施軍法統治期間的局勢發展和分析。

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標誌著東歐共產國家政治改革的新里程。一九五六的匈牙利事件是人民羣衆在知識份子的領導下企圖推翻共產黨政權，因此很快便受到蘇聯的軍事干預和暴力鎮壓。一九六八的捷克政治改革運動主要是共產黨本身自發的改革運動，而人民羣衆也歡迎這次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出現人民和共產黨對立的現象。可是蘇聯是不能容忍任何的共產黨政權在體制上有重大的改變，因為這樣會動搖蘇聯的控制（南斯拉夫是個好例子）中蘇交惡也是爲了中國堅要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捷克的改革運動便也在蘇聯的坦克的驅逐下灰飛烟滅。經過匈牙利和捷克事件的教訓，東歐的知識份子大多同意以下的四點結論：（一）由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必然會更改共產黨的體制而導致蘇聯的干預。另一方面由下而上的改革必然要同時能夠保存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二）由下而上的改革不能夠採取秘密的組織方法，一切都只能公開地進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改革運動並非向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挑戰。（三）改革的具體策略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結構以外建立其他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不是要取代共產黨的地位，而是作爲國家尊重公民權利（如罷工）的保證。（四）改革的最終目的便只能是爭取公民權利的行使，而不是行使公民權利去推翻政權。波蘭的工會運動在推行之初大抵是依據了以上的四點。團結工會的成立代表着由下而上的運動成功地在國家結構以外成立了足以迫使國家尊重公民權利的社會組織。團結工會的活動一直都十分公開，因此政府可以一夜之間更瓦解了工會，但是應該明白這是團結工會的組織原則，而非是某些評論所說的政治無知。團結工會的領

袖華里沙多次宣稱工會運動是非政治性的，他的意思是說工會無意取代共產黨的地位。

引用一些社會分析的概念，波蘭的工會運動代表著民衆社會（*Civil Society*）脫離國家（*State*）而獨立。民衆社會的概念早在十七、十八世紀便出現，用以表達人類社會無非是一個需求得以滿足的體系（*A system of needs*），而社會上便存在了各種的組織和體制去調節人的需求，如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等。民衆社會的範圍被界定為不涉及政治成份的社會生活部份，因為這部份所涉及的需求都是與生俱來的。馬克思批評這種概念，指出社會的運作並非真正滿全人的需求，僅僅是受著統治階層的政經利益所操縱，因此社會改革不單是改換統治和被統治的位置，而且要徹底改變生產方式，換言之是徹底改變以前社會對於滿足需求的形式。因此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便大條道理地將以前屬於民衆社會的領域也納入了國家運作的範圍，進行社會主義云。但這些國家卻把馬克思說國家機器要漸以萎縮的話拋諸九霄雲外，做成現今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極權的國家。波蘭故然不會例外，波蘭的團結工會便是要擺脫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控制，要將社會重新組織在合乎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礎上。但這樣是否能夠對共產政權不構成挑戰？

波蘭教會的位置其實便是一個既獨立但又不致動搖波共政權的社會組織。團結工會能否仿效教會？答案是可以但是有條件的。波共能夠容忍教會，除了波蘭的歷史因素外（請參看本書「教會在波蘭」一文）更是爲了教會的組織運作方式基本上只是由上而下的指會方式（*hierarchical*），不怕演變爲

一發不可收拾的羣衆運動。同時教會對宗教自由要求也只是針對了社會生活的其中一個範疇，不致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假若團結工會要成爲教會之外另一種獨立但不會威脅共黨政權的社會組織，便要將他們的活動範圍縮窄爲工人經濟利益的爭取，多少像西方國家的工會。但宣告團結工會成立的格坦斯克協議便包括了准許教會利用傳播媒介（由政府所控制）等條文。畢竟，團結工會產生於一次龐大的羣衆運動，不會在一下子之間便萎縮至一個細小的圈子，而波共的策略便正是要使團結工會的活動局限在一個狹窄的圈子內。波共當局在承認團結工會之後，一度大舉搜捕熱中於民主化的知識份子（西方媒介所宣稱的「離心份子」或「不同政見者」），其用意便是要將團結工會和流傳在知識份子層份的民主運動分隔開去。但是團結工會沒有將自己孤立起來，以罷工促使被補的知識份子得到釋放，而知識份子在團結工會內便一直扮演著活躍的角色。團結工會的榜樣後來更導至農民和學生推行類似的組織。這些都說明了團結工會的運動正向着社會每一個層份進展，而對傳播媒介的爭取更是這種進展的合理表現（參看本書「傳播媒介的爭取」一文）。

另一方面，在組織上，團結工會極之側重民主（參看「團結工會」一文），故有別於教會。因此團結工會必須尋求另一種策略去確保國家以外的社會組織能夠獨立地安排社會生活。

在團結工會內出現了兩種意見（參看WOJCICKI: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收集於 *Telos* no. 47）一種主張團結工會採取一種非政治性的眼光去對待社會生活的問題，即是說建立一個獨立和民主

的文化領域，而政經的領域則繼續由共產黨去支配。另一種意見主張進一步將社會政治化，直至民衆中出現一股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不是政黨），到其時執政的政權（依舊是共產黨）會執行民衆的意願。而民衆的意願則透過各方面的民主社會組織所表達。

這兩種策略都待假定共產黨繼續存在，但前者無非是要向共產黨求取一點空隙讓人民自由發揮，其實是教會模式的翻版，這種策略被團結工會的具體鬥爭否定了，事實上這種策略等於是自殺，試問一個工會運動怎能夠限於一些文娛活動？另一方面，面對着瀕於崩潰的波蘭經濟，面對著物價上漲，團結工會怎能夠不清楚表明態度？因此團結工會選取了後者的進取策略，這種策略並非是激進，因為實際上並沒有另一種較為溫和的策略。在傳播媒介裡聽到的所謂「激進」派便往往是一些提出實質行動建議的，而以華里沙為首的所謂「溫和」派其實並沒有另一種「溫和」的策略，他們只是不同意已經提出的一些實質行動而已。至於部份團結工會人士所號召的全國投票——被認為是直接導致軍事鎮壓的原因——也只是要迫使波共承認他們一直不想承認的事實，因而迫使波共決心推行切合人民利益的改革。

這樣考慮，團結工會並非因為策略錯誤或過激而遭鎮壓，而是因為波共太過不濟。這點便是整個波蘭事件的最大諷刺。在蘇聯軍事干預的威嚇下，波蘭共產黨的繼續存在僅成了工會運動的必要因素，然而由於波共的自欺，以為經濟困難是由罷工做成，不肯承認罷工是對不合理經濟政策的抗議，迫使工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全國投票。當波共看清自己的處境、看清一己的腐敗時，便急急以血腥的暴力去掩飾一己的醜惡，由工會運動到軍事鎮壓便是這樣的一個史無前例的歷史悲劇。

波蘭工運的歷程

志剛

波蘭於十五世紀，因受西歐國家影響，同業公會（GUILDS）已在國內建立了勢力，而於十八世紀末，波蘭曾二次受俄德奧三國瓜分，飽受磨鍊的波蘭人民已孕育著團結愛國的精神，他們憎恨外來統治，愛好自由及民主，而工會便在這時期開始發展，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後，波蘭始復建國，工會在這時期更趨團結，當時農業的工潮最為普遍，可是，大多工會都是由POLISH SOCIALIST PARTY（PPS）的成員所控制，而工會便成為他們政治的武器，雖然當時的工會是為爭取公平的工資和較好的工作福利而努力，但其最終目的是為對抗政府。到了三十年代，因為德蘇妥協，波蘭再次被瓜分，終於引致第二次大戰，德國失敗後，波蘭復得建國，但因受蘇俄勢力影響而成為共產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七月，政府仿效蘇聯工會的形式，以中央集權政策來重組工會，自此，工會便受CENTRAL COUNCIL OF LABOR UNIONS（CRZZ）所控制，工會失去獨立自主權而間接成為政府的一份子，這無疑引起不少工人的不滿，加上波蘭政府盲目引用蘇聯式的經濟管理體系，以致國家出現經濟危機，最後於一九五六年六月採取提高物價的措施，人民已飽受糧食短缺，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不得不起而反抗，故引致波茲南（POZNAN）工人的罷工和示威，終於波黨第一書記奧哈布下台，而由哥穆爾卡（GOMULKA）接任。其後亦有四次大規模的罷工風潮，分別發生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九七六年六月及七月和八〇年七月。

五六年的「革命」

飽受戰火蹂躪後的波蘭，在五六年間，政府施行強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尤其是高度集中重工業及其依附的副工業發展，集體農業公社的失敗，城市人口激增導致失業率提高等，帶來了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

其主因是由於政府的盲目依隨蘇聯史太林化的模式。工人們了解到改變現狀的方法，便要來一次革命。因此六月時，波茲南市工廠的工人發動大罷工，更迅速變為成千上萬人的示威遊行。示威者更向警察局、監獄、電台攻擊。波政府立即調派大批軍隊從血腥鎮壓。但更激起了羣衆的憤怒。隨之加入的有格但斯克、格丁尼亞等的工人。政府知道此次罷工不單是受顛覆者所煽動，也是由於經濟危機所導致的不滿情緒的累積。

7

有見及此，政府在波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決定改善經濟狀況。不但增加食物及消費品的市場供應，更提高生活水準，給農民有更大的土地自決權及增加工人對工廠系統的參與。工人議會雖然隨之而成立。但因政府的滲透下，只作為一官方代言機構而已。五七年間，政府在權力穩定下，便從武力鎮壓來應付罷工。更在五八年二月，正式禁止一切工人罷工的權利。此幾年間的工運，只作為其中一個流產「革命」罷了。

七〇年罷工風潮

一九五六年十月，哥穆爾卡上台後，他曾答應尊重工會的自治和支持當時成立的工人議會，但這只是他開的一張空頭支票，這無疑打擊了工人對政府的信心，還有，波蘭政府爲了要重整經濟，只着重於增加生產效果而忽略了工人的權利，一九七〇年

初，政府實行了一個新的工資制度，工人的薪金直接受國內的經濟影響，但國內的經濟日漸衰落，至十二月，糧食及燃油價格上漲，工人要求取消加價和新的工資制度，一次大規模的工潮因而產生，最後哥穆爾卡被迫下台，由蓋來克（GIEREK）接任。

七六年事件

蓋來克上台後，便積極重整經濟，於一九七一——七五年，國民收入平均增長九點八%，同時還增加了人民的薪金，取消了工資所得稅，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因世界性通貨膨脹下，進口的石油，原料及糧食價格大幅度提高，國內經濟開始崩潰，人民要排隊購食，其實這也歸究於蓋來克執行了一套脫離實際的經濟政策，只着重於依賴外債，重視加工的出口工業，忽略了國內急需的日用產品，亦忘記了七〇年工潮的教訓，不積極發展農業，導致國內消費品及食品（特別是肉類）短缺，卒於一九七六年六月，政府被迫提高食品的價格，引致罷工風潮，政府終於在二十四小時內取消加價措施，但至七月，政府又被迫提高肉類的零售價，又再次引起罷工及示威，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凍結肉類價格及爭取工會獨立。

8

八〇年工運再起高潮

一九八〇年，七月初，波蘭再次發生工潮，是次起因是由於政府突然將肉價提高一倍。首都華沙工人立即發起罷工，不到一星期已有十萬多人加入，更蔓延到其他城市，作出全市罷工。在此壓力下，政府被逼取消加價，並加薪一成至成半。工潮遂緩和下來。及至八月初，眼看政府未實現其承諾，

更將列寧船塢三名現「工人報」委員的工人解僱，其中包括華里沙。因此華沙清潔及交通工人與船塢一萬六千多工人，發動罷工。更成立了罷工委員會，提出多項要求。在工潮蔓延下，政府只得答應大部份要求，將三人復職，更答應為七〇年罷工死難工人立紀念碑及保證不進行報復。但因對罷工權利等的政治要求仍未滿足，工潮便蔓延到格但斯克，格丁尼亞和東波特三市。更成立了總罷工委員會，向政府提出十六項要求。波政府便成立一個談判委員會，想以逐個擊破來減弱總會的力量。總會便禁止私自談判，一切由總會出面——其計才不得呈。波政府不但派遣軍隊在郊區注防，更切斷一切對外通訊，以免罷工消息散播。但總會以恢復通訊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政府只得依從。及後，罷工工人與日俱增，不久已達三十萬多。還增至廿一項條件。而罷工也發生於波茲南、羅茲等地方。政府雖然多次派人談判，但也沒有結果。他們又不惜改組內閣以作緩和危機，但作用不大。無論政府施行任何政策以作鎮壓，但最後政府也只得答應全部要求，工人有組織工會權利，及罷工權利。更釋放政治犯和公開國內外消息。更保證言論及信仰等自由，工潮遂暫告終結。

總結

傳統以來，波蘭人民是愛好社會主義及民主的政治，他們亦承受天主教的道德觀念，知道自已的責任。他們對不平等的政策及剝削工人階級的統治者，都加以反抗。

自第二次大戰後，波蘭成為共產國家，由於經濟政策的失敗，國內長期缺乏糧食，為了緩和經濟的緊張，政府要大幅度增加物價，而造成多次罷工

浪潮的導火線。在早期的工潮，工人未能團結一致，他們所要求多是環繞著物價的降低及社會福利等問題（如五六年），到了七〇年，一些知識份子如學生也加入他們的行列，於後期，工人階級日益團結，也察覺到政府政策的腐敗及失職，以及社會上不平等的制度，他們以社會平等的思想，民主自由與獨立武裝起來，所以於後期罷工風潮中，工人除了要求降低食品價格及爭取工人福利外，更着重於工會的獨立，言論的自由及參與決策的權利，他們對政府的經濟政策作出批評，如在一九八〇年的工潮，在他們發表的廿十一點要求中，於第七點後才提及一些減低物價及增加工人福利的要求。又因五六、七〇及七六年的工潮都被政府以政治手腕或武力平伏，故在以後的工潮，工人還要求政府答應保障罷工者和其幫助者的安全，而工潮也多以妥協的形式出現。

波蘭人民爲了爭取自己的權利，採取了一種最有效的行動形式——罷工。於多次的罷工風潮中，亦有示威，焚燒黨部，阻塞交通等事情發生。不過，罷工只是短期有效，爲了不要浪費一次罷工的成果，宣傳和聯絡的工作是十分重要，而且還要有人去監督工人的要求的實現，如工人不曉得發生甚麼事和怎樣去行動，他們便沒有可能單純的佔據工廠和迫使廠方作出讓步，團結工會中的「社會自衛委員會」就是扮演這個角式。大體而言，波蘭的罷工風潮可以說是一場革命，因工人企圖改變波蘭社會整個制度及生活方式。

無疑，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中，共產黨是工人無產階級優秀份子的代表，在取代資產階級的政權後，由無產階級獨裁專政，但現今的波蘭，產業多屬國家所有，工人難以參與政治，雖然於一九八〇年九月，波蘭政府准許有自由工會成立獨立的「團

月十三日，總書記雅魯澤斯基將軍以「軍事救國委員會」名義，實行軍法統治，逮捕工會重要人物，馬克思是反對「拿破崙主義」，現今的波共却成爲「槍桿裏的政權」，波蘭工會日後的命運，亦難預料：不過工會一直以來都希望「民主社會」，而不是「官僚主義」的社會，他們所指的民主就是工人議會與國會並存。

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

——團結工會 木

前言

12

在一個特別的地方，一個不尋常的鬥爭時刻中，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誕生了。團結工會自八〇年成立以後，備受世界各地人士關注。它之所以受人注目，在於它的獨立性和羣衆性。而團結工會所代表的，是血與淚的成果。波蘭之歷史代表着一個附庸國之悲劇，屢次受着土耳其、俄國、普魯士、奧地利等伐掠和控制。因此，波蘭在無數次被侵、亡國、復國的磨練下，民族精神是非常頑強不屈。而團結工會之成立正代表着這民族之掙扎成果。

團結工會之出現

從五六年、七零年和七六年的三個工潮中，都表現出波蘭工人無比的戰鬥力，不畏強權和力爭到底的精神。由於在七六年的工潮，知識分子加入了工人的行列，這不但表示出知識分子與波蘭工人的運動作了進一步的聯繫，而且也構成對黨領導的一個威脅。在八零年中，這個威脅終於爆發出來，迫使蓋萊克下台。

八零年夏天的波蘭，在西方銀行的壓力下，爲了縮減開支、節省外匯，蓋萊克再度停止價格補貼，不但讓食物價格上升，而且還採用兩種肉類供應辦法。它們分別是國營肉店，雖然價格較爲穩定，

但供應卻大為減少，另外一種是商辦肉店，價格是容許自由上落，因而令到肉類漲價至50%到75%，有時甚至高達100%。這些政策，終於造成七月初的工潮。

在七月第一、二個星期，格但斯克列寧船塢一萬六千工人首先罷工，工潮更沿波羅的海蔓延，就在短短的兩個星期內，整個波蘭也陷於工潮，就是達西爾斯（蓋萊克的出生地）的礦場工人亦不例外。波共政府面對著這個重大壓力，被逼答應凍結肉類價格和加薪一成至成半，工潮遂慢慢緩和下來。

但由於波共政府普遍未能夠實現承諾，於是在八月初，工潮再度蘊釀，並且迅速伸展全國。在八月十六日，總罷工委員會在格但斯克成立，工人更由反對加價的要求轉變為要求對經濟上及政治上的改革。他們共列舉了二十一項要求，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求組織獨立團結工會。終於在九月六日，蓋萊克被逼下台，由卡尼亞接替為波共總書記。上台後的卡尼亞，除了答應加薪，改善社會福利，更答應由工人控制的獨立團結工會的成立。

13

會之內部組織

當列寧船塢的罷工漫延時，其他地域的工人也加入助陣，後來更組成「總罷工委員會」，也就是團結工會的前身，委員會的成員是來自各種不同的行業和工廠。

波蘭全國共分為四十九個行政地區，每一個地區是由一個中央政府特派的領袖管轄，團結工會便是一個遍佈全國而以地區作為行政單位的組織，當有事情發生時，會員會從不同的行業出來，在不同的地區上為團結工會做事。

由於波蘭政府是所有工業唯一的僱主，而不像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個別僱主，所以工會的矛頭直指波蘭政府，而且會員是來自不同職業的，再加上工會是分地區性的，在組織和行動上都比較容易和有效率。但另一方面，由於分地區而不分職業，因此每地區的帶領會比較弱，因為不可能瞭解每種行業的需要和要爭取的權利。因此，黨裏的人就利用上述論點來打擊區域中的組織，例如提出這類問題：甚麼是煤礦工人的財產？為什麼煤礦工人要和理髮工人參加同一個工會？那一個國家會有此種工會制度？

14

團結工會的總部座落在格但斯克的一所海員旅舍裏，華沙的工會則佔用一所研究院的數層作基地。大部份的工會基地是一些被破壞過的建築物，沒有完善的設施，辦公室所用的工具多是捐贈得來的，由於電話還是很缺乏，各區的聯絡得靠電報，雖然是簡陋的外殼，但工會裏面有主席、財政、油印、選舉、救傷等部門，而且日常工作異常繁忙。

像其他的工會會員一樣，團結工會的大部份收入是來自會員所繳交之會費。會員入會時需填寫表格表明願意將每月入息的百分之一作會費。以一千萬的會員計算，工會在一個月大概的收入為美金一千七百萬元，實際上，真正收入會較此為少，因為一些效率較差的地區在收集入息時比較困難。除了靠會費外，工會也會籌辦音樂會等活動來籌款，還會用拍賣方式將一些捐贈得來的物品拍賣。每次拍賣都可獲得約五萬元美金。

開支方面，大部份用作修理一些渡假屋、酒店、運動場所等設施約佔其收入之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十交給格但斯克的中心，而餘下的則為每區的各自用途。付清一切工資、租費、交通費之後，團結工會還有餘剩，可惜的是他們不能隨便運用金錢

來購買一些工具或電話等等之物資。

工會的架構是以三個階層劃分的。最先是工作環境，跟着是地區，最後達到全國。他們的目標都是為直接或間接的實行民主。所以選舉領袖或每區的主席時是十分謹慎的，選出來的主席要取得人民的信心。大概每一千個會員便組成一個選區，可分為以下三種分法：第一：一間超過一千名會員的大工廠；第二：一千名同職業但不同工作地點的會員；第三：一些偏僻地帶包括一間學校，一所研究院和一間金屬工廠。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七日，三十三區的代表齊集在格但斯克推舉了華里沙為主席。大概十四日便開一次大型會議，由各區代表和主席等交流經驗和講述各區的事件。或許他們會商量來一次短期的罷工以顯示他們的勢力和合作。除了中央和地區性的會議外，在工作區內，會員之間都會有接觸的機會，聚會中，他們有權發言和提出一些意見幫助中央做事。

15

總結

總括來說，團結工會是一個與別不同的組織，在幾個星期內便做好了地區工會的外殼，組成以後，還能夠有效地替波蘭工人謀取福利和要求。

如果工會繼續此次方針做事、能做到民主和收集意見、領導階層沒有自大的想法、能夠不沾官僚作風、替工人出一點力等的話，那麼工會的功效便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至了！成果——是苦還是甜？

工會並沒有帶給工人加薪，因為加薪在波蘭來說是沒用，物價的暴漲，貨物的不足卻是最需要醫治的。而他們（會員）認為工會帶給他們的是自我主宰命運之權利。工會帶給工廠或機構的是更有效

半的管理和生產。因為會時常警惕工廠的主管或經理，因此無形中也增加了全國的運輸和管理的效率。

至於健康和工業安全方面，一些太嘈、太髒、危險等地方都被管制了。雖然廠東要花人力和大量金錢來提供一些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但因為受着工會的壓力促使廠東要負起這些責任。自從工會成立以來，官方發現到意外的發生率多了，其實，這全都是因為投訴的人多了，所以做成紀錄的意外發生率漸提高。因為工作量的減少，實質上，意外的發生是減少了。

獨立和有力的團結工會的設立也提供了人民申訴的好地方，所以在接見室外時常出現人龍。最令人興奮的要算是工會帶給人民有充足的糧食（在聖誕期間，政府果然提供了足夠的肉類給人民）。一些屋宇的分佈、醫療、退休金、運動場所設施都是由於工會的存在而進行得如火如荼，這一切都帶給人民有歸屬感和自由，波蘭人民現在活得比以前更有意思和價值。

波蘭階級分析

晴明

總覺得要清楚一個國家，先把它內部各階級作一個客觀、簡潔的分析是一個少不了的途徑，待各階級的情況都清楚後，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也就不言自明了。階級與階層的分別，在於階層一詞只泛指社會上的一切分層，因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社會功能而劃定。而階級，則具有互相抗衡、互相息關的意味，且在生產關係中佔一個不可少的角色。

波蘭的社會形態屬於強加式的社會主義，（Imposed Socialism），國內不可避免地分為兩大陣營：共產黨（波蘭統一工人黨）及廣大的工農羣衆。而在廣大的羣衆內，又劃分為農人、工人；知識份子向來是浮動階層，為清楚界定起見，他們也因自己的社會功能而分割成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傳統知識份子負起維護波蘭傳統文化的使命，有機知識份子則服務於黨，在波蘭社會中則表現為科管階層（工廠主管或經理），他們是黨在工廠的代理人的一部份，自然是屬於波共的那一邊。

17

（一）農民

波蘭在歷史上曾三度被瓜分，每次都有蘇聯的份兒。所以波蘭人民對蘇聯並沒有好感。反之，因為波共的合法性不夠，他們對於集體所有制極度地反對。這一階層對直接政治的參予最少，但他們仍然能透過否決的機會影響政府。在非常時期，他們可以拒絕農作物向市場出售，用以作為對政府討價

還價的本錢，特別可抵制政府施行不利於他們的經濟政策。市場貨物的減少對波共及蘇聯都是敏感的；波蘭土地有百分之八十是私有的，波共透過市場的交易對部份農戶的依賴造就了一部份較為強大的農戶，一般都相信把農作物拋向市場出售的農戶比自耕自給的小型農戶有利得多。

(二) 知識份子

如依據葛蘭齊的分析，知識份子可分兩類：傳統知識份子及有機知識份子。傳統知識份子在波蘭多以作家或教士的姿態出現。事實上，波蘭的作家們對於學術特別是政治、哲學等十分有貢獻，他們傳統上領導著波蘭文化的團結與道德規範。波蘭作家是監察社會的一股力量，波蘭作家協會更是一個為上述目標而成立的組織。（可惜這個機關是在黨之下成立的，限制了改革的積極性）。服務於政府當局者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姿態，由一九四八年至五零年，工廠企業的管理人全是黨書記或直接隸屬國家機器的。下一層的小管工的參與性極低，根本不成什麼「科管份子」，迨至五十年代中期，由於工管教育政策的見效，工業上遂出現一羣新力軍，他們挾著深湛的理論，要求在企業控制更多，無疑地，他們與原先的小管工必然發生衝突。他們形成了後來波共的「科管份子」。科管份子自一九五六年後非常受重視，他們求薪得值，權力也擴大，但他們不成什麼階級，因為中央工業部分簿了不少的管理權，再者，科層份子嚴密地受著中央政治局的控制。

波蘭工業化的過程是連同教育政策的突破而來的。回顧歷史：一九六〇年實施全國普及化的免費七年教育，同時，工業學院及中學也大程度地擴張

。據數字顯示，一九三七至八年只有一萬人就讀中等工業學院，迨至一九六九年至七零年，人數竟上升至八十二萬四千人。一九三七至八年就讀於高等學府者只有四十九點五人，一九五〇至一年上升至一百二十五點一人，至一九七〇至一年竟增至三百二十九點四人。一九六九至七零年，唸機械工程的學生人數比一九四九至五零年的幾乎增加十倍，唸文科的則只增加四倍。

在長期的教育政策培養之下，工科的學生當上科管份子的又分成兩類：其一認為科管份子是中性的，他們飽學且精於科技，在科技社會中他們最終的價值是科技上的決策；另外一類則認為一個科管份子也應是一個政客。前者不代表工人利益，也不代表中央，他們把企業的利益置於首位，相反，後者却認為應代表著黨及國家，當國家與工人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負起溝通二者的「橋樑」作用。

19

在科管份子中，他們的待遇也不一致，導致他們之中也有分層分派的情形出現。以下是各代表行業管理人的收入比較表：

部 門	廠 長	部門主理	高級技師
鋼鐵業	191.5	182.5	105.5
電 業	174.0	141.0	88.6
機械用具業	130.0	124.2	87.0
化學業	119.0	115.0	88.0
食物業	112.0	117.5	100.0
紡織業	85.7	88.3	71.2

成衣工業等於100為基數。

(三)工人

戰後的波蘭在力圖工業化與城市化下造就了大批勞動工人。他們主要集中於重工業部門如鋼鐵工業

。再者，傳統上的金屬及棉織工業也佔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在工業衰退時期，金屬與棉織工業的工人最具反抗壓迫的經驗。早在戰前的波蘭，工人們已懂得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他們也有著不少的鬥爭經驗。一九五六年工人議會 (Workers' Councils) 在工廠的成立意味著工人勢力的蓬勃。一九五六年後，工人議會有權力提議廠長及副廠長的人選。不斷地，他們要求著企業的獨立；廠長資格的提高，這對波共及整個官僚組織做成威脅。

波共有鑒於此，也頒佈了若干的條文限制工人議會的權力：(一)廠長有權拒絕工人議會的意見，(二)當廠長及工人議會起衝突時，他們可向黨高層上訴(這個政策其實有意把工人議會置於黨控制範圍之內)。

20 一九五九年，工人自治會 (The Conference of Workers' Self-Management) 成立，包括工人議會 (The Workers' Council)，工廠附屬PUW-P的委員會 (The Factory Committee of the PUWP)，工會的工廠議會 (The Factory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s) 社會主義青年聯會代表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 及高級技術組織的支部 (the Branch association of the STO (Supreme Technical Organisation))，在這裏，廠長和各部門管理人並不形式地包括在工人自治會之內，但他們必要出席其所有會議。

工人自治會的權力如下：

- (1) 制定該企業的基本發展方向，審裁及通過基本計劃方針。
- (2) 監察及控制該企業的功能以及一切行政活動。
- (3) 領導企業走上合理發展的途徑，(諸如決定科技拓展的方針，工作組的運作及如何使生產力上升等)。

(4) 決定工廠資金的分配，訂定工作法例等。

工人自治會的成立不是工人由下而上運動的成果，依上述的規劃看來，工人的權力實在非常有限。縱使工人們積極參予工人議會，但在決策的緊急關頭中的幹事會 (Presidium) 則只包括一名工人，工人議會的幹事會通常由工作主管人控制大局。

試看以下企業內的領導組織構圖：

企業廠長 (Director)	副廠長 總會計 生產部門首長
----------------------	----------------------

工會主席 (Trade Union
Factory Council)

PUWP 委員會第一書記
(Factory Party Comm-
ittee Departmental
Party Organisation)

21

工人議會幹事會主席
(Workers' Council Departmental
Workers' Councils)

在多元權力中，工會及委員會第一書記的權力壟斷最大。黨駐工廠委員會 (Factory Party Committee) 擁有一個甚或多個全職黨書記，工會方面也擁有一個全職的主席，於是，其餘兼職成員的權力便大大受影響。至於工人議會，它只可能拒絕或建議修改一點決策而已。

還有，在地方上，黨的重要性並不比得上企業單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相信廠長是地方上最具權力的人，而不是黨書記之類。

以上僅就波蘭的各階級敘述，俾能提供一清晰的輪廓。由工人議會之權力受限制來說，可見在團結工會成立前工人權利之單薄，至於深一步的分析，還需要我們再細心探討。

糟糕的波蘭經濟

22

木鶴

錯誤的經濟計劃，是造成波蘭今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波蘭重新建國，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當時波蘭的經濟政策跟從史太林模式，投資高度集中於重工業及其依附工業的發展，但投資大、效率低，及後經濟更過份依賴西方，以致西方經濟衰退時，波蘭亦無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加上官僚腐敗，波共合法性低，所以無論在實施現行政策或進行改革時，都遇到很大阻力。

投資過度集中於重工業

波蘭建國以後，跟當時所有共黨國家一樣，將大量投資集中於重工業及它的附屬工業，忽略了農業、輕工業的發展。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波蘭經濟已疲態畢露：農業、輕工業發展落後，人民食物、日用品嚴重短缺，必須由外國進口；農業集體化失敗，城市人口激增導致失業率急劇上升……經濟陷入嚴重危機。一九五六年波茲南事件的爆發，導致反對盲目跟從史太林模式的哥穆爾卡上場，他上場後雖然推行了一連串的經濟改革，但並未就過份集中於重工業這一基本問題加以解決，以致時至今日，波蘭人民依然是每天大排長龍，輪購食物和日用品。

投資大 效率小

蓋萊克上場後，為鞏固領導地位及加速國家工業的發展，向西方大量舉債以投資工業部門。國家投資總額從55—58年的2710億增加至59—63年的5012億波幣，投資成長率由每年的6.3%增加至8.9%一年。但礙於波蘭經濟是

國家指令方式，工人意見不能和工廠領導人溝通。雖然生產關係先進，但生產力落後，以致重工業的生產力十分低劣。例如花費了50億美元興建於加托維斯的煉鋼廠，每年只能生產四百萬噸鋼，又投資了十億美元的輕型拖拉機製造廠，每年亦只能供應五百部產品，而計劃中却是七萬五千部。所以雖然投資額大了，每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國家收入反而減少，國家收入每單位投資成長率由55—58年的0.335%跌至59—63年的0.201%。

經濟過於依賴西方

重工業的龐大投資計劃，需要大量貸款，因此波共便需向西方先進國家大量舉債。國際能源與原料價格上漲，使經濟靈活的西方國家大受打擊，波蘭也因此被牽入困境，國際收支赤字大增。同時由於對農業的嚴重忽視，以致必需從西方進口糧食與飼料，這就進一步增加了外債，同時亦增加了波蘭對西方的依賴。另一方面，波蘭外銷能力未獲重大改善，工業產品品質低劣，難與西方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23

合法性低

波蘭位處蘇聯之隣，多年來波蘭人民都備受俄國壓迫，因此波蘭人有著傳統的仇俄心理，而波共之取得領導地位却主要是倚仗蘇聯的支持，所以波共之合法性自建黨之初便十分不穩固。加上蘇聯在1948年的血腥屠殺，波共的自主更被懷疑。在建黨之初，大多工人只是為了職業之方便或作為黨員所可以享受之優待而加入共產黨，而不是基於政治性的認同，這類黨員的增加對波共合法性的提高並無

作用。另一方面，自1949至1974，波共的工人階級黨員的百分比由60%降至40%，而科管階層之黨員則由17.3%增至42.5%，這顯示出波共黨員的成份已不再是以工人爲主了。黨的許多政策皆不是以工人或人民的利益爲出發點，所以黨所指令的經濟政策便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及工人的合作。

官僚腐敗

波蘭的經濟困境的導因之一是錯誤的投資，而錯誤的方向則是由掌權的官僚過份野心和不切實際的做法所做成。

24

掌權階級集中了決策權，而他們作出決策時多著重個人利益，物質特權和職位，却忽視整個社會的利益。這些純粹爲個人利益的行動，往往做成錯誤的投資決定（例如建築新卡托維茲方案）和外國貸款的揮霍。

加上波蘭政府內部貪污風盛，又缺乏民主，草擬經濟計劃時不但忽視他人意見，更不接納別人批評，遂令波蘭經濟沒法得以改善。

結論

雅魯澤斯基上台後，已著手進行黨的內部改革，官僚腐敗的問題似已有所改善的機會，但「合法性低」，「經濟過於依賴西方」，及「過度集中於重工業」這些辣手的問題，却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因此波蘭經濟的前途仍然未可樂觀。

社會主義神話下的 危機

水草

自從1980年大罷工以來，外電不斷報導波蘭的消息：缺少糧食；缺少日用品；到處出現搶購潮；婦女由清晨六時在冰天雪地的街頭輪候食物……。其實波蘭的情況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可怕，波蘭人民並未陷入飢餓狀態，只是消費品的供應追不上需求，使人民產生缺糧恐慌，到處搜購食物而已。

波蘭的生活水平亦不是想像中的低，據資料顯示，波蘭的國民生產總值是世界首二十位以內的。比波蘭人民生活得更困苦的国家多的是，如羅馬尼亞、匈牙利、北韓甚至中國等，雖然同是共產國家，但都未發生過龐大的工運，為何條件更好的波蘭竟率先發生龐大的工運呢？是純粹因為生活的困難、經濟的危機嗎？這原因似乎是不足以解釋一切的。

1980年簽訂「格但斯克協議」的場面，使我們看到波蘭內部潛伏著的問題。簽訂協議的場面，就有如兩強簽訂和約，顯示工會與政府之間，再不是一個上下的關係，而是兩個均等的敵對勢力的關係。在人民的眼中，政府再不是高不可攀的權力機構，而是一個敵對的行政機構。要問：為什麼政府的角色是敵對的行政機構而不是擁有最高權力的機構呢？問題在波共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上。

波共的合法性危機

首先我們從歷史中追索，看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執政黨）在取得政權上的合法性。

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前身波蘭工人黨是在1918年成立的。那時的工人黨為極左份子所控制。他們支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以在1920年俄國入侵波蘭的戰爭中，工人黨和俄國軍隊站在同一陣線。他們低估了自從1795年被沙俄瓜分後波蘭人普遍的反蘇情緒。他們對蘇俄的支持引起了人民強烈的反感，結果他們失掉了百分之八十的黨員。後來雖然改變方向重新支持波蘭獨立運動，但已改變不了人民對他們反民族主義的印象。

整個20年代波蘭工人黨（後改名波蘭共產黨）都是一個很小的黨，在1927年最高峯時期亦只有六千黨員。在1938年，更因蘇聯權力鬥爭的影響，被國際共產黨秘密解散。居於蘇聯國土的黨員大部份被槍殺或下獄，包括了黨中央37個領導者中的30個。哥穆爾卡亦在這時候下獄。

26

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工人黨重組起來，以爭取民族獨立為目標。這使到這新組織能在戰火中慢慢的擴張起來，由1943年的8000黨員增至1944年的20,000黨員。到1945年，波蘭工人黨更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組織臨時民族統一政府，黨員迅速增加至235,000人。1947年，工人黨領袖當選為總統，工人黨正式掌握政府實權，成立了波蘭人民共和國。

但當時工人黨雖有廿多萬的黨員，卻很大部份是農民，而且不少是因為能獲得職業和政府照顧而入黨的，真正為政治投身的人並不多，這是黨內潛伏著的危機。另一個問題是，波蘭人始終感覺工人黨是乘著外國勢力（蘇聯——波蘭的頭號敵人）奪取政權，然後強加於他們頭上的，所以傳統上對共產黨帶著多少敵視。可見長久以來，波蘭執政黨的合法性都是不足夠的。

波蘭的經濟危機

1948年12月，波蘭工人黨和清除了右翼份子的波蘭社會黨合併，成立了以貝魯特為首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執政黨），並把哥穆爾卡以右傾民族主義的罪名開除出中央委員會。貝魯特追隨蘇聯的政策，實行「史太林主義」經濟模式，實行剝削工人以累積資本投資重工業和實施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不但引起了擁有小資產的農民的不滿，也引起了工人的不滿。不少工人黨黨員離黨，把黨和人民的距離更拉開了。

貝魯特的蘇式經濟政策證明失敗，1956年6月，波滋南的工人發起了反薪酬制度，反加稅，反官僚主義的大罷工，釀成了53人死亡的流血事件。這次流血事件開展了工人與政府鬥爭的歷史。結果貝魯特政權由恢復名譽的哥穆爾卡代替。

27

哥穆爾卡上台後，實施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措施，容許計劃和管理權的下放，承認工人議會，設立花紅和件薪的工資制度，並把農業合作社解散，把土地從新私有化，企圖藉此刺激生產。但基於仍然是行著「史太林主義」經濟模式，加上官僚主義，行政不協調等弊病，哥穆爾卡亦難逃失敗的命運。1970年底爆發了格但斯克列寧船廠大罷工，抗議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政府最後迫於無奈地讓步，答應增加工資。很諷刺地，在罷工者的代表團中，竟有40%是共黨員，可見當時黨內已現著叛離的危機。結果哥穆爾卡被迫下台，蓋來克走馬上任。

蓋來克上台後，訂立了新經濟政策，企圖以大量國外貸款開始一個龐大的投資計劃，以期波蘭在短期內以國外的先進科技和機器來生產較有外銷能力的輸出品，賺取外匯，迅速發展經濟。在70年代

早期，的確有過不錯的經濟增長，且被譽為「波蘭的奇跡」。但74年以後，波蘭經濟即每況越下，加上外債日重，遂陷入不可解的死結。爲了向外國銀行交待，波蘭政府只得剝削人民的利益，以套取資金還債。具體的辦法是調整物價和凍結工資。

物價的調整立刻引起工人的強烈反應，1980年7月，各地工人羣起罷工，最後成功地爭取到「格但斯克廿一條協議」，並成立了全國性的團結工會。工人至此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獨立組織，看問題亦漸漸從經濟性轉向政治性，開始針對政府的行政問題、經濟政策問題，權力結構問題甚至國家模式問題。在「波蘭團結工會綱領草案」中，明白的指出「對於波蘭的經濟危機，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它的社會和政治上的因素」。至此，波蘭的問題從經濟危機變成了政治危機。

政府的合理性危機

合理性危機發生在晚期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生在共產主義國家。當一個政府負擔愈來愈多社會責任（如福利、交通、教育、科技研究、軍事發展），她的工作多方面觸及人民利益時，工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便時常成爲人們關注的核心。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會計算他們所付出的（稅款）和所收益的（福利、保障等）是否平衡。當一個政府的工作不能滿足大部份人民的預計時，便會出現合理性危機。人民會懷疑他們所得回的是否合理，是否被剝削。在共產主義國家情況更爲嚴重，因爲絕大部份的公共設施、工業甚至企業都是政府管理和籌劃的，人民的所得直接由政府訂立，結果任何的不足都會引致合理性的懷疑，人們會估計是否受到剝削。進一步的不滿更會導致對政府的信任危機，直接影響

到政府的合法性。

這情形在波蘭顯而易見，從貝魯特到哥穆爾卡到蓋來克到現在的卡尼亞和雅魯澤斯基三十多年的共產黨統治，都未能把波蘭的經濟收益較平均分配到工人手裏。工人目睹官僚層擁有郊野別墅、私人遊艇、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種種特權，更增加被剝削的感覺。而波蘭實施以剝削工人累積資本的「史太林主義」經濟政策，更是不爭的事實。自蓋來克實施借貸經濟政策以來，工人更多年來沒有增加實質工資，而食物和日用品價格不斷上漲，激化了工人的不滿情緒。工人開始懷疑政府的合理化，進一步追問問題的根源，把種種行政的漏洞（如官僚主義、貪污弊病）、政治本質問題（如經濟政策、指令式中央計劃、權力壟斷）都揭示出來。正因為這些經濟政策都是通過政府官員實施的，所以就是純粹的經濟問題亦與政治連結，很容易的變成了政治化的合理性危機。

29

波蘭工人意識到他們的危險，「人民的生活情況將變得更壞」，因為「政府並未提出一個綱領來領導國家走出危機」。當政府不能把人民帶出困局的時候，她的合法性便由根基處開始動搖起來。人民開始不信任政府，因此有去年12月醞釀的全民投票，決定信不信任政府，是否繼續由政府統治。

意識形態的危機

隨著對政府的合理化懷疑，人民的意識形態亦轉向與政府敵對。傳統上，波蘭人民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戰爭精神。因為從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波蘭基於地 形勢 四面都沒有天然防禦力量（波蘭為平原地帶，四面無山。）

基於波蘭四面平原，沒事天然的防衛力量，經

常腹背受敵。加上在歷史上經歷過三次瓜分，波蘭人民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戰鬥傳統。這些傳統使波蘭人民在遭受壓迫的時候能奮起反抗，反映在現今的局勢上，就是在遭受政府的剝削時，轉化成一股集體行動的力量，對抗政府的權力。這是傳統意識形態轉化成的危機。

另一方面，波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信奉天主教的，天主教追求公義平等的精神，在波蘭，轉化成一種革命語言，成爲一個共同戰鬥的目標。正如他們在「波蘭團結工會綱領草案中所說：「我的基本任務——保衛勞動人民——是基於奉行社會公義的原則的。我們將努力使這個原則成爲所有國家活動基礎。我們要它成爲解決所有社會政策和羣體生活的組織的基礎。」

總結

經濟危機加上合理性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使波共政府的合法性普遍地被懷疑。正如上面說過，當一個政府被大部份人民懷疑它的合法性時，便隨時有被推翻的危險。波蘭的團結工會發展到去年十二月的時候已踏上了這個階段，有推翻現時政府以建立一個新政府的趨勢。可以說，工會所以會踏上這一步，完全是基於一個經濟危機變成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危機的原故。這正解釋了爲什麼波蘭工人在相對地不錯的生活水平下仍會選擇工運爲解決問題的途徑。

掙扎——

社會主義與 現行之社會主義國家

—丁

31

踏入二十世紀，共產革命之陸續爆發，到底是意味着歷史發展之新進程，抑或祇是這世紀中之一點火花，這點祇有後人可以回答。由於這，現今社會主義國家之發展尤受人注目。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面對資本主義陣營，一方面要擺脫資本控制，另一方面為維持國家經濟而必須保持與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貿易這一點，也沒有一條唯一或明確之路線，而這個矛盾，亦是這等社會主義國家所深受的。面對目前波蘭之情況，不少人亦會對社會主義發出疑問，希望解釋在這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之無產階級運動。本文將試圖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社會性質，探討無產階級運動之意義。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當資本主義被打敗後，隨之而來的不可能是共產主義，而是一個社會主義之過渡時期。這個時期，有其獨立之社會形態。一方面，資本主義雖然已被打敗，但還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式之意識形態及生產模式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剛剛誕生，但還是非常脆弱。所以，在這過渡時期中，社會是由資本主義份子與共產主義份子之混合物組成的，在經濟領域上呈現着共產主義集體勞動與小商品生產形式，在政治領域上呈現着資產階級之殘餘份子。而在社會主義時期，當資本主義殘餘份子正在消亡，而共產主義逐漸鞏固中，必然出現兩個形式之社會階段。

32

資本主義是依賴市場運作作為資本累積之根源，由於國內市場之不足，資本家得進行跨國貿易，因此形成一道資本主義國與國之連繫；而表現帝國主義。所以，當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一國為建立新的生產模式，必須脫離資本市場。而國內之生產關係，亦隨之而起變化。資本主義式之私有制及人與人間之剝削，基本上已被消滅，一切生產資料已歸為社會所有，由國家支配。而社會上每一成員，必須付出自己之勞動，才可獲得產品，而所獲得之數量，就是按照每人所付出之勞動量分配。在這按勞分配原則下，經濟上之階級對立已被消滅，但這階級並非意味着人之平等已經實現。因為，每人有不同之能力，不同之生產能奈及不同之生活環境。比方說，有些人年青力壯，有些人年老，有些人需養活家人等。如果以同一勞動尺度衡量每人之分配量，仍有不平等存在。但作為剛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結束而隨之而來之形式，及作為社會主義之第一

階級，這種分配制度是改革過程中之一環，而這種資產階級法權，亦是過渡進程中之手段。雖然資本及剝削基本上已消失，而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一定階級之統治機關及作為保持階級社會「秩序」之作用已為消失，但由於資產階級法權仍舊存在，所以在這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本公有制，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

但社會主義並非就停留在這層面上，它必須引渡入真正的人人平等。隨着人民意識之提高，及階級之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形態逐步被取締，資產階級法權必要消失，保衛這資產階級法權之國家機器也必要消亡。此時，人類已能擺脫奴隸般之工作，迫使人們機器般之分工也不復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之對立也消滅。勞動已不再是謀生之手段而是生活所需，大家各盡所能來提高國家生產力。人不再祇是生產機器，而能全面地得以發展。社會財富屬於全民所有，但卻不須「國家」作為分配工具，而是每人按需要自由地取用。當社會發展至這階段，社會主義之過渡性已經結束，而共產主義革命改造已成。

33

但社會主義過渡是長期性的，依賴着資本的徹底消滅和人民之積極性。所以一方面需要由無產者實行長期對資產階級之專政，從資本主義代之以社會主義改造，另一方面需要實行長時期對無產者之社會主義教育，並推行廣泛的民主，以推動人民參與改造。

無產階級專政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要依賴羣眾之力量，是由受壓迫者親自組織起來鎮壓壓迫者。在消滅階段過程中，當由無產階級進行專政，掌握社

會主義之過渡社會。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下，階級並未徹底消滅。但這階級之關係與資本主義社會下之階級對立起了很大的變化。資本主義下的是由少數資本家剝削多數之無產者之關係，而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社會仍包含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中間形態。因此資本主義時期之階級分化仍然存在。這時期中，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代表着各階級之利益，但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一方面在外間資本及資產階級法權下，社會還不斷地生產着資產階級殘餘，影响着社會主義化之進程。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面對的，是各階級間之利益互相衝突。比方說，在工農國家中，工人當然要求農產品價格偏低，但農民則希望爭取較高之價格；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管理人員與生產作業工人也扮演著支配與被支配之階級矛盾當中。

34

無產階級專政下之無產階級成爲社會之統治階級，爲鞏固社會主義發展。首先，他們得鎮壓剝削者之反抗，防止他們對社會起着有害之作用。面對社會主義時期之中間份子，則需進行領導、影响之工作。中間份子是指一般之農民、小資產者，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剝削之一羣，然而他們亦是產業私有者。因此需對他們進行教導，吸引入無產者之行列。對於已歸國有化之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則須善用其支配權，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政權。

但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單獨靠人民意識進行，需要由先鋒黨作爲領導。先鋒黨當包括無產階級之優秀份子。共產黨作爲這個先鋒黨，當領導無產階級進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各領域上之更生，並指導國家進行改革。

但黨未能代表廣泛之羣衆。而工會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起了非常特殊之作用。它是獨立於黨和國

家權力以外之組織。雖然無產階級專政是由先鋒黨領導，但其性質仍然是羣衆性的，而黨指導下之國家機器仍得服務於羣衆之利益。在這方面，工會擔當着橋樑之角色。它是包括着無產階級，而站在黨和國家之間的羣衆組織，在於建立起先鋒黨與羣衆間之聯繫。首先，工會是爲廣泛地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之組織，工會包括着工人，是一個當權階級之組織，但其本身並非國家組織，而是一個教育之組織。在社會主義過渡期中，社會主義化是需要羣衆意識上之醒覺，因此，共產主義之教育是極其重要之一環。另外，在工會也得將黨、羣衆、國家之間關係貫徹。黨脫離羣衆之可能性，一方面由於黨走得太快，未能適當地領導羣衆走上同一步伐；另一方面由於黨內出現官僚制度，致使對羣衆不聞不問。工會就是爲防止上述兩種情況之出現而組成，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下之羣衆性。

35

此外，工會也是代表着羣衆之利益。國家在過渡期中仍持有資本主義生產性質，國家內仍有階級矛盾。因此，羣衆相互間和羣衆與國家間利益之衝突是在所難免。工會在面對衝突時，得從工人利益方面着想，幫助爭取合理之待遇，但當然這亦得以不損害國家整體或其他工人之利益而出發。

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之中間形態下，工人之罷工是不被否定的，列寧在談到罷工時道：

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裏採取罷工鬥爭，其原因只能是無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着官僚主義弊病，它的機關中還存在着各種資本主義舊殘餘，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於勞動羣衆在政治上不開展和文化落後。

無產階級民主

無產階級專政所指的，是對資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民主，並通過教育，以發動人民之積極性。因此，民主是作為過渡時期之一階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這是作為消滅階級之前提，即每一公民，都有同等之權利和義務。民主是承認在國家內人人都有平等之公民權，每個人都有掌管國家之權力，這樣，每人亦有義務去參與國家決策。

社會主義國家中之社會主義

現今之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相信這是很多人急欲解答的問題。當然，由於每一國家革命過程不同，在政策取向方面也各異。在已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中取得政權所面對的，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阻礙，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矛盾。在半封建之落後社會中所面對的，是落後之生產力與先進之生產關係之矛盾，生產力更成為生產關係發展之絆腳石，試問當人民未嘗溫飽時，管他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呢？所以，為解決內在之矛盾，每個國家都有不同之向社會主義步伐。邁向社會主義之方法並非唯一的，但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有數個前提，作為過渡至共產主義之階段。這些前提，上面已經提到，就是粉粹資產階級殘餘、生產資料國有化，國家之羣衆性和廣泛實行之民主。

但我們發覺，在現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呈現着兩種現象。首先，國家成為凌駕於人民之上之統治機構。人民從實行專政者變成專政之對象，國家政權祇是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共產黨亦失去其先鋒黨之角色及領導國家之功能，轉而成為服務

於國家之作用之下。國家政權變得更專更牢，這與列寧所提的社會主義過渡期下國家消亡之過程是背道而馳。其次，社會主義發展是要求從資本主義形態下，進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各領域上之根本轉化，才能過渡至階級之消亡。但在現今之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是凌駕於其他領域之上的。各國所注重的，是生產力之高度進化，但卻忽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辨証關係。

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之社會運作，是為黨及國家政權內之官僚特權所鞏固，形成牢不可破之惡性循環。官僚之出現，蔽塞了人民參政之道路，祇形成由上而下之專制。人民民主被剝奪，公民之義務，從參與國家決策變為服從國家政策。在這情況下，國家與人民之間之溝通也被切斷，國家之統治手段祇有逐漸遠離羣衆。

波蘭之社會主義模式無非也是局限於上述之範疇。另一方面，波蘭國內仍普遍存在着個體農業和小商品式生產，政府亦無長遠之計劃，幫助生產上之集體化。而波蘭頻頻高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債項，旨在發展國內之生產力，而忽略生產關係上之改革，此舉祇有進一步令波蘭擺脫不了資本主義之控制，使波蘭在經濟進而在政治上極端的依賴和不穩。在政治上，波蘭之黨，政是共治一爐，人民沒有參與國家決策之權力，工會祇是附從國家之機關，未能代表人民之意向，更遑論維護人民之利益了。而當國家經濟不景時，人民祇有負擔國家決策成果之份兒。因此，波蘭內之政策無非是閉塞了社會主義發展之前提。

今天，波蘭人民要求一個獨立於黨和國家以外的工會。波蘭的工運，到底是由於官僚之滋生，抑或是工人政治意識落後？團結工會會員佔全國三份一人口，會員之衆，可說是可以代表羣衆。他們之

要求，在於工人之自決，對國家政策之監察權，工人利益之保障，和對國內官僚之擊破。由此可見，波蘭工人所要求的，無非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內應當存在的工會的出現。

波蘭經濟改革與 管理自主化

木弓

波蘭經濟困境

除了政治的因素外，波蘭今天的危機，可說是主要由於經濟不振所做成。波蘭的經濟在八一年中已到達災難性的邊緣，糧食不但要配額和輪候，更有部份消費品在商店全然斷絕供應。在出口方面，亦遭重創。波蘭的煤產本是歐洲第二位，但因生產計劃的失敗，比從前下跌近五分之一，連供應國內之用，亦出現不足。因出口的無能，在外匯上，波蘭以借貸維生，到八一年六月，已欠下西方二百七十億美元。因外匯的不足，原料常出現短缺，加上電力供應的不穩定，使各工業產量大降。

39

在農業方面，近年來的失收，使糧食必須向外進口。波蘭的農地，有四分之三仍在私人手上，為使農地能國有化，政府多方面打擊私人農業，如不供應肥料、農業機械，因此在農業上的產量，波蘭遠遠未能達到其應有的產量。

經濟改革下可行的模式

在一撮不振的經濟狀況下，經濟改革成為人民的意願。在格但斯克協議中第六點，便有這樣的要

求：「實施挽救國家危機的方法，讓公眾了解經濟形勢，開放改革的言論。」

在芸芸眾改革建議中，有三種的模式是值得我們去探討。其中的一種以極度的共產化來代替現行的模式。支持此說的人認為波蘭今天的經濟困難，主要由於輸入過多的西方機器與技術。這一切用以減輕在生產上工人的成本，與社會主義生產——沒有資本主義勞工市場——起着矛盾。更因西方在貿易上的剝削和外債的利息，拖垮了波蘭的經濟。因此建議減少與西方的貿易，決意實行所有土地國有化，切實地實行指令經濟。

但這模式，在今天的波蘭決難實行，因與西方的關係，已是騎虎難下，波蘭內部的不穩，和波共在人民心中地位的合法性，均使推行全面指令經濟成不可能。其實，即使這模式能實行，試問今天那個共產國家能成功地實行指令經濟呢？

40

另一經濟改革的模式，以西方的自由經濟為藍本，實行自由企業與管理，針對改革今天因經濟動力集中於國家手中，引致官僚主義阻礙發展，令經濟中的計劃與現實脫節，經濟內部不同環節之間的平衡嚴重失調。

但要實行這種模式，使波蘭走上新的困境，她的「老大哥」蘇聯決不容許此等資本主義的經濟存在於其附庸國。波蘭無論在經濟和軍事上，均與蘇聯有着密切的關係，如源油和糧食的輸入、貸款，還有其他種種關係。因此，此模式絕不可能在今天的波蘭實行。

最後一種模式，以計劃與管理自主化結合，此模式由團結工會的經濟所提議，這種制度也曾在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試驗。此模式認為由政府建立整個架構，於架構下，各企業得以自由運作

。波蘭管理層由統籌一切改爲負責財務、計劃和貿易，在企業和生產部門內，工人全權負責管理，企業得以在價格和勞工政策上得更大的獨立性。價格以反映市場的需求爲目標，政府如強迫企業生產無市場的貨品，政府便應作合理的賠償。

這一模式，雖較前兩種溫和，採取中間路線，但在實行上亦是困難重重，因如此一行，大量的波共管理層便會面臨失業，估計會有近二十萬的政府官員受影響。此等官員大部份皆波共要員，且入息可觀，依靠他們的人亦爲數不少，因此阻力是極大。

經濟改革的困難

自八零年格但斯克協議後，波共對經濟改革所允許的諾言，遲遲還未履行，採取拖延或敷衍態度。如於八一年初，政府委員會便草議一報告書，被

41

工會經濟學者布加滋 (Bugaj)，認爲是言中無物。究其原因，實與政治因素有關。早於七零年時，因管理不善，引致經濟困境的官員，今天正處高位，負責審判自己的過去。雖有大量官員受調查和撤職，因其經濟管理不當和貪污。但如卡尼亞和費格爾斯基(於現在處理國內經濟)等要人，正是當年與蓋來克共同管理經濟。

另一方面，要有長遠的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穩定的政黨，但今天的波蘭，正缺乏一有力，得民心的領導集團；而以工會的形式經濟改革團體，亦是波共所不能容忍。如哥穆爾卡統治期間的工人議會，便遭瓦解。

最後，改革所引起的問題，便是失業問題。如採取管理自主化，大量的管理官員便失業，任何生

產的現代化，亦會引致大量工人失業。

團結工會與經濟改革

團結工會雖以非政治性的性質成立，而以改良經濟和民生為目標。但任何的經濟改革和自治，均難避免不涉及政治。如工會於成立後，在一些生產單位內，因助工人自治，迫使部份管理官員換位。真正的經濟改革，如止於表面，未能掌握經濟決策權，皆流於空洞。今天團結工會被認為干預波共內政，而遭鎮壓。其實，工會並無蓄意奪權，而是在進行真正的經濟改革路上，必須走上的一步。

總結

真正的經濟改革，必須是經濟決策機構組織上的改革，而經濟真正為人民服務，亦只有是當工人當家，自己掌握着決策能力。今天雅魯澤斯基，以改善經濟困境和國家安定為名，實施軍管，但軍管只能扼殺經濟改革，使波蘭的經濟走上更嚴重的危機。

波蘭八部——

政治經濟分析

伍可祥

一 經濟 史太林模式

波蘭經濟實力其實不弱。波蘭的工業增長率，在五十年代佔全球第三十位（平均每年4%）；六十年代佔第十四（8.3%）；71至77年躍登第五（11%）。1948年Bierut鬥垮民族主義的Gomulka成爲波共領袖，全面落實蘇聯支持的史太林經濟模式，內容是：工業金融商運國有化；政府全權處理對外關係；實行實物計算的中央計劃，以行政指令執行；把資源集中投資工業，尤其重工業，減少消費；推行農業集體化以支援工業擴展。於是十分側重重工業發展。51至65年工農投資比例4：1，平均增長率是11.4和2.7。同時農業集體化失敗，56年集體化耕地只佔8.6%。到六十年代末期，蘇聯、中國、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已把90%以上耕地國有化或集體化，波蘭只有14%。

43

自從確立了史太林模式，而農業集體化失敗，波蘭主要是並存着官僚指令和私人自耕兩種生產方式。其中又以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官僚指令爲主導。

這種官僚指令生產方式受兩個機制支配著：①中央機制，主要在中央部門執行，要在保障官僚特權階級整體權益的基礎上，滿足經濟成績指標的要求（總產值、GNP……）以維護統治的合法性。

②派系機制，官僚內各部門派系，要在擴展自身權益的基礎上，完成統一計劃。

史太林模式根據第二次科技革命後，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重工業主導的資本主義工業化規律改裝而成，因而特別強調重工業的帶領地位。而重工業擴展又可較少顧慮農業生產和消費需求的制限，方便官僚自我膨脹。於是派系機制失調，重工業部門起先佔強大和關鍵的地位，得以不斷在人事、權責、資訊和物資的控制上愈滾愈大。採礦、鋼鐵、機械和電力部門的主管、經理、技師和工人的收入，均高於其他行業；人數增長也最快。66至70年間，計劃的重工業和輕工業增長率是47.7和36.5，不久便發現實質能履行的是55和33。這種派系機制失調，又導致中央機制陷入困境。重工業自我膨脹，使消費品短缺，農業也缺乏真正的支持。像波蘭這樣實行史太林模式的國家，雖在六七十年推行過各式各樣的改良，但始終沒法扭轉這機制的失調。此外，還有官僚腐敗，計劃組織不善（開工本低，存貨堆積）等困難。官僚平時不會輕易改革，當面臨壓力時又只能匆忙應付，難有周詳計劃。

二 危機 東歐與波蘭

七十年代東歐各國全部面臨農業落後的困難，而經濟結構失衡和效率低落，又做成工業增長的退減。A和B是71至75和76至79年農業平均每年增長率；甲和乙是71至75和76至79年工業平均增長率：

	東德	捷克	波蘭	匈國	羅國	保國
A	2.7	2.6	3.7	4.9	6.5	3.0
B	-1.8	1.2	0.3	2.1	5.7	2.6
甲	6.5	6.7	10.4	6.5	12.9	9.1
乙	5.6	5.0	3.7	4.8	10.3	6.5

七十年代輸入西方先進工業設備，是東歐各國的普遍策略。可是七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的兩難局面。於是入口的工業設備和糧食價格急升，而東歐製造出來的工業製品又不能大量高價地送回競爭劇烈和面臨衰退的西方市場。於是貿易不利，債務激增，下表是捷克、匈牙利、波蘭從73至78年增長中的總債務（億美元）：

捷	0.9	1.1	1.5	2.2	2.9	3.5
匈	2.0	2.3	3.2	3.4	4.1	7.0
波	2.5	4.9	7.8	11.0	13.0	17.0

可見債務激增已是東歐國家的普遍危機，確以波蘭最烈。此外，羅馬尼亞也宣佈暫無力還債了。

儘管是普遍危機，但工人團結反抗運動首先崛起於波蘭，總有些特殊理由。波蘭有一特色是90%人信奉天主教。可是在政治上，教會組織只能發揮微弱的作用（不管在妥協、牽制還是推動方面）。在精神上，天主教宗教語言，已被證明可以翻譯成傾向革命或完全反動的政治語言，而翻譯方面却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社會力量。此外也有人提出波蘭民族意識很強。但只有當民族意識在具體的政治結構內轉化成批判統治者合法性的持續因素時，才是革命的動力（譬如，可能恐懼蘇聯侵入、破壞民族統一前途，反而防止了反抗）。因此，今次運動的特殊理由是：

①波共合法性能力低落。波蘭工人戰前名聞全歐的鬥爭傳統；波蘭歷史上屢遭俄國侵略；波共是由蘇聯扶立的政權；更重要的是戰時經驗（二次大戰時、匈、羅、保等協從納粹德國，而波、捷、南等却有著名的反抗地下軍，人民有廣泛自發的戰爭動員經驗。卒之南斯拉夫脫離了蘇聯控制；工業科技較先進的捷克出現了知識份子為主的68年「布拉格之

春」)。這一切加起來，使波共難以建立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正因合法性能力低落，先是農業集體化失敗，使波蘭先遇上嚴重的農業制限，對於工人和其他受薪者，波共也只能滿足他們的消費要求來保持安定，結果是暴露了消費品不足。終於又進一步打擊了波共的合法性，激發了反抗力量。

②經濟結構背景。下表中，A是65年每人平均所得比例，以蘇聯=10為基數；B是農業佔總產值的百分率；C是67年科研支出佔每人平均所得百分率：

	東德	捷克	波蘭	匈國	羅國	保國	南國
A	15	12	8	8	5	7	6
B	11	12	19	20	29	33	28
C	64.4	79.0	29.0	28.9	13.5	7.4	2.4

46

可見東德和捷克經濟水平較高，工業化發達最大，農業佔額小；羅、保、南則相反；波蘭和匈牙利夾在中間。波蘭和匈牙利有較羅、保、南強大和成熟的工人階級作為反抗力量，又沒有東德捷克那麼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科層人員去面對經濟困難。而且匈共有較強的合法能力支持預早從上而下的「新經濟機能」改良，波共的合法能力却較差。

三 分析 階級和階層

為什麼無產階級的政權是鎮壓無產階級？一般可以用「新階級」來解釋：經濟落後的國家在革命後出現新階級專政。新階級假無產階級之名，行專政之實，鎮壓一切反抗力量，而標榜國家民族利益以求擁戴。因此要鎮壓反抗的無產階級，也因此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互相侵凌的鬧劇。可是，要更好掌握波蘭的社會性質，必須從實際的階級和階層分析開始。在波蘭並存着的兩種生產方式——官僚指令與私人自耕，確立了三個基本的階級：

①官僚特權階級。他們坐在黨政軍三結合的官僚體系的高層位置上，憑政治力量掌管官僚指令生產中的生產資料，對全國各層份進行極權統治。他們既一致地維持統治權（中央機制），又各自擴大自己部門派系的人事、權責、資訊和物資控制權力（派系機制）。

②無產階級。官僚指令生產中的受僱生產者。（包括國營農場的工人）生活普遍受官僚制度干預。此外，就像資本主義的工人一樣，把生活分割為苦燥的生產部門和鬆懈的消費部份，一切需要往往被首先轉化為消費的需求。

③自耕農。由於地主和富農已遭剷除，集體化程度小，農業生產者絕大部份是自耕農。他們擁有小塊的土地和小量工具；佔勞動人口三分之一，而提供全國總生產的六分之一，較保守個人和區域的利益，却受官僚指令的限制和影響。他們在黨政上少發言權，對波共沒有敬意，往往抵制和逃避波共的政策。

各階級中間，填充著幾個重要階層。他們可來自各階級，但一旦加入這階層，便有相對獨立性：

①軍人。隸屬官僚體系的鎮壓部份，受官僚特權階級指揮。較高級及技術性的崗位，任期較長。大部份低級軍人來自徵兵，服役兩三年，較接近人民。

②學生。波蘭戰後大力開展普及教育，尤其是工業教育。學生是有機會向官僚體系攀升而未有固定工作崗位的階層，在準備為官僚服務中蘊含反叛性。

③傳統知識份子。他們追隨特定的文化傳統，不直接明顯地為任何階級辦事，包括文化界、科學家和教士等，在波共管制、儘量保存相對自主的空間。

④有機知識份子。指依附在官僚體系內，協助官僚特權階級統治的知識人。他們在波蘭可分兩類A、波共執政初期因政治行政需要而摘取舊管理者和工人，加以補習，進入官僚體系。他們要在政治上純

潔，服從政治方針而處理行政實務，權責未事專業的精細劃分，組成了政治官僚體系。B、其後波共擴展教育，大量生產了具專業訓練的畢業生和研究員。他們逐漸滲入官僚體系，強調專業學問，各部門專業獨立和工作效率，權責要精確劃分，形成科技官僚體系。

四 霸權 意識形態戰

統治者的合法能力，就是統戰各階級和階層的能力。統治者要各階級和階層接受統治，不起反抗。各階級和階層的意識形態，可有不同的關注重心，譬如關注一般環境；關注統治者；關注改革的前景。他們會參考構思或不參考構思其他社會制度。接受統治的意識形態逐可區別為六種：先是把重心放在關注一般環境上，①「命定」，把現狀視為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無需解釋的，根本不理會其他制度的存在；②「安適」，專注現存制度所炫耀的優點而忽視其壓迫、惡劣的性質，因而樂意安居。如果被統治者察覺了現存制度的壓迫、惡劣性質，他們可能是盲目地搗亂發洩，也可能轉而關注統治者，③「敬從」，認為統治者具備某種尊貴本性，應該敬從其指示，更不必比較和考慮制度的優劣；④「認同」，以為統治者的措施是能夠代表自己的利益，或代表自己認為善良的一面，因而願意讓它統治。如果被統治者已對統治者不滿（這時合法性已頻臨破產），他們可能要求改朝換代，也可能轉而關注改革的前景，⑤「退隱」覺得不會有正面意義的改革，亂極而治、治極又亂，無可奈何，唯有設法開解和逃避；⑥「恐懼」，參予構思了改革的理想，但害怕被摧殘和鎮壓，不敢動彈。

軍人、學生和知識份子，都是統治者需要團結

和控制的階層。統治者要透過他們，以達成統治功能和跟被統治階層構通。軍人是集中的暴力。他們自覺掌握暴力的責任，而且受嚴格的紀律訓練，是波共政權比較穩定的支持者。他們的訓練突出了對指令的遵從，主要是停留在「敬從」的範圍。他們要捍衛民族，而視長官為民族的捍衛者。學生和知識份子較多思想時間，很難統戰在固定的框框內。不過，較優越的待遇和較大的晉升機會，使人部份學生和知識份子認同了官僚特權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安適」或「認同」。傳統知識份子和一些不滿的學生即使對官僚的管制不滿，亦難組成強大的抗議力量，只能在「命定」、「敬從」、「退隱」或「恐懼」的狀態下接受統治。波共的極權統治深入民間，要求工農階級正面支持其「社會主義革命」（即意識形態的關注重心須在統治政權身上）。其中，自耕農階級的農村生活較保守局限（不易參與構思其他社會制度，不易求變），無產階級則是波共自稱代表他們去革命建設（求變，因此要參考構思其他社會制度），因此波共期望自耕農階級的「敬從」和無產階級的「認同」。

五 歷史 改革的失敗

48至56年間BIERUT 領導下的波共，全力套用史太林經濟模式。可是馬列主義沒有機會在農民生活中扎根，戰時體驗却演化成民族主義的要求，波共是蘇聯扶立的政權，被農民視為陌生的外來的干預者，談不上什麼尊貴的本性。波共得不到農民的「敬從」，集體化失敗，統購政策也被抵制和逃躲。在無產階級方面，起初波共也從他們那裏提升幹部（有機知識份子），強調是無產階級專政。其後在50至55年間，從學校培訓出來的大批專業知識人

湧。GOMULKA當然要統戰工農。他取消農業集體化的推展政策，結果使八成集體化了的耕地也變回私人自耕。56年成立各企業的工人議會參與企業決策，但黨政幹部不久又滲入其中取得控制；59年又實行自治運動，實質上是把工人議會的功能收在官立工會選下。59年後，自治會由工人議會、波共黨委、官立工會、企業經理綜合組成，據OWIECZKS調查所得，波蘭工人對企業內組織觀感：

	工人議會	波共黨委	官立工會	企業經理
可信者	14.1	22.3	45.1	13.5
決策者	11.1	32.1	16.9	40.6

50

工人對工人議會的可信性和能力均不樂觀，信任最少的經理被認為是最有力的決策者，可見波共對工人統戰是失敗的。56年後，波共受工運壓力，文化政策較開放，63年後又重新收緊，惹來了多次文化界和大專學生的反抗。可是工業部門不斷擴大，新的（尤其是從農村來的）無產階級批判意識不強。無產階級雖有不滿，但也有不關心。根據65年WIDERSZPIL調查所得，3300國營企業工人中，有三分之二根本不知道企業自治會的主要決策。沒有成熟的進官僚體系，成為新的有機知識份子。政治官僚體系開始容納和轉向科技官僚體系。舊一批有機知識份子一部份已攀進官僚特權階級（如BIERUT, GOMULKA, GIEREK, KANIA等）；一部份轉移到黨組織、小企業等不大強調專業學識的領導崗位上；另一大部份被擠回無產階級羣中。於是無產階級開始感到不能真正參與決策，而對極權統治產生不滿，而專業的有機知識份子也深感舊政治官僚體系的束縛，提出批評。56年無產階級吸納了從領導崗位跌回來的積極份子，批判意識大大提升，乘著蘇聯批判史太林的餘波，爆發了首次大規模針對波共的工運。這次反抗雖然是無產階級的反抗

，但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只停在批判統治者的階級，而未發展至關注改革前景的階級。結果只能改朝換代，由GOMULKA重新領導。GOMULKA進一步引進專業的有機知識份子，把權力部份下放給企業主管，在縱綫的中央部門指令外，又建立橫綫的企業聯合，加強生產單位的靈活性，希望用引進科技官僚體系的辦法打開局面。無產階級支持，文化界和文專生的反抗（譬如68年的抗議巡行）全遭鎮壓。

僱傭勞動下工人的需要被首先轉化為消費需求（和減少工時），但由於政經一體化；工人經濟上的要求可以迅速轉變成政治的要求。波蘭經濟改革改變不了派系機制的失調，側重重工業。波蘭戰前重工業佔工業總產值47.1%，50年52.6%，60年59.4%，70年更增至63.6%。因而消費品短缺，物價工資齊升，實際工資却難有增加。70年波共企圖大幅加價，却被反加價工運把GOMULKA轟下台。

接任的GIEREK面臨普遍的懷疑和不信任，建立了諮詢制度緩和民憤，容忍有限度的批評。在他策劃下，71至75年實質工資總增長率達78.5（%），遠高於羅、保、捷、匈之39.1、29.5、29.5、27.5。波蘭與蘇聯東歐貿易佔總外貿百分比，從71年的62降至74年的47；與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則從28上升至44；外貿赤字也從1479波幣升至9935。GIEREK的政策就是大量引進資本主義國家先進設備以謀生產力突破，又不斷加薪和輸入糧食以安撫工人。74至75年資本主義經濟衰退，波蘭貿易情況更慘，外債激增。GIEREK企圖由工人負擔惡果，加食物價60%，引致76年工人大規模反抗，被迫取消。工人罷工委員會保留不散，成為日後獨立團結工會的地區組織。80年波共再圖加價，工運再起，GOMULKA下台。

六 軍管 奪命鎖喉槍

52

80至81年間，工人的抗議和要求迅速地政治化。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重點進一步從質疑統治者的階段提升至要求制度改革的階段。80年11月獨立團結工會的正式成立，當然是個重大勝利。一般西方工會爲了方便進行薪酬、工時、福利的討價還價，往往因應一個行業或一個企業體系而建立組織。蘇聯中國東歐的官立工會也是以經濟部門爲組織單位。波蘭獨立團結工會却由35個地方工會組成，實行企業——地區——全國的三級制。這是仿效波共統一工人黨的利於作政治鬥爭的組織形式。各地獨立團結工會不僅作經濟鬥爭和政治討論，而且廣泛處理一切日常生活細節問題，儼然與波共抗衡。81年團結工會會員是波共黨員的三倍有多，而波共中下層幹部有半數加入團結工會。這意味着處於官僚體系中下層的有機知識份子廣泛地動搖了（到82年軍管後，已有過半黨員脫黨）。學生和傳統知識份子的激進部份也分裂出來，支持團結工會。81年11月學潮蔓延全國。教會追隨著大勢，也批評政府。原籍波蘭的教宗也支持波蘭工會。文化政策被迫放寬。影院竟公映了WAJDA、ZANUSSI 等人一系列批判社會現象的電影。WAJDA的「鐵人」更直接刻劃80年格坦斯克的工運歷史背景。部份激進的知識份子，如自衛委員會的成員等，投進團結工會內成爲智囊，成爲依附於無產階級的有機知識份子——革命知識份子。農民也參與構思了工人提出的新社會制度，跟城市無產階級互通聲氣，終在81年2月正式成立團結農會。

80年10月接任波共總書記的KANIA面臨各社會力量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大圍攻，而不管政治官僚體系還是科技官僚體系的處事方法都已黔驢技

窮。以往各領導人上台均有獨特的一套改良方法，但KANIA只能清洗黨員，暫行肉類配給，要求大家合作，再提不出任何改良方案。時間愈長，對官僚特權階級愈不利，蘇聯也頻頻施加壓力。81年JAR-WZELSKI的軍管鎮壓已是官僚特權階級最後的力量。波蘭32萬正規軍中只有七萬直屬內政部的特種部隊執行軍管鎮壓任務，波共還要撲合基層的忠心幹部去鎮壓。可見官僚特權階級已不能保證軍隊普遍的「敬從」了。

把軍管鎮壓歸咎於工會激進傾向，是錯誤的。除非能瓦解團結工會力量，否則盡早進行軍管鎮壓是官僚特權階級必要幹的好事。問題是工會的戰鬥能力還未夠醒覺和鞏固。重要的困難是：①未能衝破各國官僚的傳播封鎖，沒有東歐其他力量的呼應；②未有解決工農階級關係農產品價格方面的矛盾（農業的落後其實是官僚長期施政的結果），沒有進一步有戰略價值的工農聯盟；③未能設法向軍隊滲透；④工會內未有足夠的作戰準備。團結工會的興起，是各層面鬥爭的結果，不能戲劇化地歸因於華里沙的「魄力」；團結工會的受挫，更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各地激進化，華里沙安撫不住。更主要的不是保守地壓止行動，而是進取地解決上述難題。今次事件正為以後的運動突出了這些嚴峻的課題。軍管鎮壓的作用，當然不在於肉體的消滅，而是在於建立「恐懼」狀態，使人懼怕受傷、死亡或蘇聯侵入。

53

七 國際 你罵我唔罵

82年以來，幾乎西歐所有國家均有聲援團結工會的工人行動。東歐和蘇聯則對內極力封鎖消息。中國起初也在反蘇宣傳的立場上贊同波蘭工運，當

團結工會成立後，却害怕國內受影響，索性不敢再提，而且暗地裏還贊同軍管鎮壓。美國爲了宣揚「共產主義的醜惡」，要發起「制裁」波蘭和蘇聯，又策動電視全球宣傳，發起「波蘭日」。西德和法國却爲了維護與東歐的經濟關係，拒絕合作。

在美蘇爭霸中，蘇聯在政治上仍控制着東歐，美國則以不能把西歐任意鞭策。其實雙方同時陷入了危機。資本主義八十年代的經濟困擾日益深重，蘇聯也面臨經濟衰退，信念危機和東歐不穩。七十年代歷史顯示了史太林模式的經濟發展面臨深重的危機，改良也挽救不了。東歐借外債輸入先進設備，是重投資本主義經濟的圈套，讓西方暫時增闢了投資出路，結果還是挽救不了自身的危機。蘇聯不能付出高昂的成本，以直接征服的方式統治東歐各國，因而必須讓東歐各國共黨政權保留足夠的相對獨立性，讓它們在國內保持合法統治地位。在軍事和經濟上，各國也各自建立一套自主的體系（只是大多仿照蘇聯的模式）而加入華沙公約和經互會，在契約上保持聯繫。基於官僚指令生產方式的性質，蘇聯在經濟上也不能憑自然的經濟規律來佔便宜。事實上蘇聯與東歐的經濟關係不能算是剝削性的。可是蘇聯是東歐各國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阻碍者，又是各政權的撐扶者，因而必然成爲各國社會改革力量的懷恨對象。八十年代的東歐正朝向普遍的經濟危機，而政經一體化的制度又是把一切不滿導向政治化的橋樑。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的逝世，正標誌着蘇聯由政治官僚體系攀升上來的老一輩官僚特權階級統治正走向終點。蘇聯科技官僚體系的勃興已使舊的政治信念出現危機。新一輩特權官僚階層如果沒有出色的獨裁者，蘇共對於向東歐動兵將更感猶豫。東歐可以是八十年代革命的土壤。

八 啓示 革命新希望

軍管不能持久。長期的軍管只會造成更深重的經濟困難和統治危機。JAWZELSKI 等將領組成的救國軍管會希望儘快「回復正常」。在軍管時或反抗不遂，或處於「恐懼」狀態的各階級和階層將有什麼轉變，還不清楚。波蘭缺乏外匯和外國信貸，生產力下降，經濟前景殊不樂觀。無論如何，今次團結工會運動為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三點重要的啓示：

①波蘭工人的實踐，提出了不同於先鋒黨職業革命家領導奪權的革命模式。先鋒黨的革命，很容易在革命後變成官僚特權階級專政。團結工會運動却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吸納依附於己的有機知識份子，並逐漸提升成「自爲階級」，把其他階級和階層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次經驗證明了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是可能的。

②這次經驗也為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典範。西方的代議民主假定既存的競選、諮詢、投票制度是客觀中立的，人民可遵循這些渠道表達「個人」意志。可是這些制度往往被設計成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而且可能已僵固過時。代表「民權」者也往往是依附於統治階級的有機知識份子。代議民主把關係各階級集團整體利害的大決定，交由分散的「個人」來表達意見，甚至僅由分散的「個人」所選出的「民權」代表去討論，使階級集團隱藏掉真對立，方便統治者操縱；分散的個人生活反而面對不能由個人改變的既成法律裁判。波蘭工運批判了代議民主，實踐了行動民主。各地區團結工會讓個人能參與改善小範圍內的日常生活，而且透過集體反省、組織、行動來實現集體的意志。制度（團結工會）是

爲行動民主而建立的；假因過時，屬從官僚特權階級利益的制度（官立工會、工人議會）則被踢開。行動民主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典範。

③儘管團結工會運動仍遠遠未能成熟到提出解決波蘭經濟出路的方案（基於以往種下的苦果，放棄官僚指令便造成龐大失業；降低農產品價格又造成與農民對立；輸進設備不是辦法，不輸進又不成，匈牙利模式似乎比較有效率，但匈牙利本身也步向經濟危機），但從大處着眼，它爲建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基本材料。本來中央計劃經濟是針對資本主義競相圖利的總體非理性生產，而企圖有理性地而對社會需要進行計劃生產。可是各「社會主義」國家均沒有組織綜合出社會需要的組織制度。具體的社會需要根本沒有組合成形，中央計劃只能按官僚兩重機制訂定的目標而計劃生產。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領域也爲著鞏固進行中央計劃的官僚政權而實行極權統制，具體的社會需要更不可能被組合出來。因此，這些中央計劃經濟，不管是加強操縱技術還是用市場機能抑或工人參與管廠（即使是南斯拉夫，也只是把社會需要扭曲拆解爲各股份持有人的收入極大化和消費效用極大化），均不能面對社會需要（根本未組織出來）。在波蘭，波共合法性能力低，工人的需要被首先扭曲爲消費需求表達出來。官僚兩重機制的生產終於不能滿足消費需求，因而陷於崩潰。團結工會運動正好是初步組合出一些具體的社會需要，而要求中央計劃爲此計劃生產。這意味著官僚指令兩重機制的刪除，意味着社會需要不被扭曲拆散爲消費需求，意味着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教會在波蘭 阿木

一、引言

波蘭政府在八一年聖誕前所頒佈的軍法統治，嚴重地破壞波蘭團結工會的力量，限制一個獨立工會的應有權利、冲散工運的領導層等等，都是違反人權及民權的原則。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去鎮壓國內的無產階級，當然是實踐共產主義的一大諷刺。不期然，我們會問：除了工會之外，波蘭還有其他的社會勢力可以與共產黨抗衡呢？我們發覺，就數量來說，波蘭的天主教徒肯定超過共產黨黨員，甚至比團結工會的會員為多；天主教徒佔全國人口的75%，波蘭工會的會員及其家屬約佔總人口的50%，而共產黨員則佔總人口的4.6%（指團結工會成立至今）。就歷史來說，波蘭天主教教會比共產黨有更悠久的歷史，更牢固的傳統、更親切的形象。因此，未探討軍法統治下教會可以扮演的角色及教會與團結工會的關係之前，我們會回顧波蘭的歷史，看羅馬天主教教會如何成為一股締造波蘭的國家文化及象徵波蘭的獨立團結的力量。

57

二、教會與波蘭歷史

(1) Piast Dynasty) 960-1386

Piast 朝時期，波蘭的國家任務是：團結散居在東歐一帶的斯拉夫（Slavic）民族去對抗德意志（German）的侵略者。Piast 朝的第一位領袖是 Mieszko 王子，為要鞏固自己的勢力去對抗德意志的邊界侵略，便向神聖羅馬帝國進貢。965年，他

與一位波希米亞 (Bohemia) 的公主結婚，翌年便接受洗禮，被譽為“波蘭的受洗”，因為從此波蘭開始接受天主教，成為西方基督教國的成員之一。此後，波蘭的天主教教會，無論在神職團、修院、堂區的數量及組織方面，都有重大的發展。

波蘭教會的建立當然會進一步推廣基督的精神，不過她還含有其獨特的文化及政治意義。在政治方面，波蘭教會的成立令德意志再不能用傳播福音為藉口，發動聖戰，併吞波蘭。特別在十三世紀，當波蘭的平分財產法把統一的國家造成分裂的局面，同時又面對俄國及蒙古的入侵時，波蘭教會便負起提醒公國 (duchies) 之間仍然有國家存在的任務。例如，纂寫教會及教士的編年史是培養國家團結意識的途徑之一：在1253年，教會勳封 Stanislaw 為波蘭的主保聖人，是次勳封召集全國各地的神職人員及教徒參加，對紛亂的波蘭來說，此舉無異象徵著國家的團結及歸一；當俄國及蒙古的威脅在十三世紀末開始減弱，教會的領袖更協助國家進行重建的工作。在文化方面，跟其他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家一樣，波蘭教會也採用拉丁文，給波蘭帶來很多西方的宗教、文藝、科學的知識及發展趨勢：拉丁的僧侶帶頭發展波蘭語的文法體系，並與國家合作，於1364年在 Cracow 創立波蘭第一間的大學，同時成為中歐的第一間大學及日後研究人民主義的國際學術中心：

可見，波蘭教會雖然不是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及文化勢力，卻有她微妙及不可否認的影響力及建樹。

(2) Jagiellos Dynasty 1386-1572

波蘭的 Queen Jadwiga 在1386年跟 Lithuania -

nia的Jagiello 公爵結婚，開始Jagiellos 朝。波蘭與Lithuania的聯盟，不但成功地擊退日耳曼民族的入侵，更為波蘭拓展更多的疆土，令她成為東歐的強國及保衛西方基督教國的前鋒。

波蘭人稱這個時期為他們的黃金日子，而波蘭教會同時也發揮其影響力。教會的地位受到國家的重視，例如國家視天主教為國教，准許教會有自治的組織，吸納教會的神職人員參與國家的事務，並要求羅馬教廷確定波蘭君主加冕的合法性。

更重要，教會是區別波蘭文化於鄰國文化的一股最大力量。十六世紀中期，在德意志境內發生宗教改革運動，改革之風迅速地蔓延至波蘭境內，受到貴族的歡迎。貴族在自己的領地內，建立新教的教會，容許她們擁有財產及物業，並決定除去天主教教會一向以來享有的司法權。新教在貴族層中流行，主要是她有政治的利用價值，但她不能在羣眾當中生根及滋長。個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新教本身沒有一致性，不同的教派把持不同的教義，因而影響其傳教的力量及效果，很難打進羣眾的生活中。此外，天主教教會內部進行若干的改革，對中古時代教會的惡習加以反省及批判。在耶穌會士的積極推動及羅馬教廷的協助下，波蘭教會的反宗教改革運動，成功地蓋過新教的發展，把天主教突出成為波蘭固有傳統文化及人民精神生活的標記及價值取向，跟俄國的東正教及西邊國家的新教有顯著的分別，從而加強波蘭內部的文化及民族歸屬感。正因為天主教有象徵國家統一及團結的作用，所以波蘭政府也樂意贊同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呼籲，消除教派之間的分裂，重振天主教教會。不過，為政治領袖來說，重建天主教教會的勢力不是基於神學觀念或傳教使命為出發點，而是為了國家的政治利益。在十六世紀中期以後，南方的土耳其人、

北方的瑞典人、東方的俄國人，對波蘭的威脅日益高漲，所以國家欲借教會團結國民之效果去對抗外敵。這一點是教會人士及歷史學者也無法否認的。

(3) 選舉的君主 (1572-1795)

由於 Jagiellos 朝的最後一位王帝沒有立嗣，所以日後的君主便改由選舉制選出，其勢力也受到由士紳階級組成的國會 Sejm 所束縛。波蘭的士紳階級勢力日益壯大，他們在國會往往運用否決權，來反對君主的提議，公報私仇。帶來的後果是領導層的分裂、政府的鬆散及國家的衰落。舉一個例子來說，士紳否決君主撥款發展現代化的軍隊，因而令十八世紀中期的波蘭也未曾建立一支正規的軍隊及外交系統，來抵抗鄰國的入侵。

60

早在十八世紀初，俄國已經向波蘭施加壓力，要求波蘭尊重其境內的東正教徒，其後又與普路士攜手，為波蘭的東正教徒及路德會爭權益，其實這只不過是她們入侵波蘭的藉口而已。俄國、普路士、奧國在1772年協定，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割取波蘭的土地，於是便開始第一次的瓜分波蘭，三個國家奪去波蘭一共三分一的土地及一半的人口。其餘的分別在1794年及1795年也給三國瓜分了。

威脅波蘭政權的勢力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面對俄國的東正教，普路士的新教，土耳其的回教，波蘭教會是維繫全國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人民認同同一身份的標記。

(4) 瓜分的波蘭 (1795-1916)

波蘭在俄國、奧國及普路士的統治下，發展是不同：在俄國統治下的波蘭人，發揮他們“有機的勞動力” (Organic labor) 致力於內部的經濟

及社會發展，來取替以往暴動式的復國行動，所以工業及農業都有進步；在奧國統治下的波蘭人，受著貧瘠的土地及過盛的農村人口影響，所以生活非常困苦，很多要移居北美或變成季節性的移民；在普路士統治下的波蘭人，由於無法晉身政治舞台，便投身經濟的發展，後來確立一個強大而且獨立的經濟組織。

不過，她們的遭遇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自己的文化特別是文字及宗教都受到統治者的迫害及藐視，情況尤以俄國及普路士地區最為嚴重。俄國政府不准波蘭人用波蘭語教學及崇拜，強迫教會接受東正教的監管，並逮捕或放逐那些違反東正教教會或教唆波蘭人民反政府的教士，充公教會的財產及下令停辦天主教的修道院。普路士政府同樣禁止波蘭人在學校及公共場所用波蘭語，拘捕喚起波蘭愛國主義的教士等。

61

然而，波蘭教會卻一直堅持要用母語來學習及進行社交活動，令其統治者不得要領。此外，教會又積極創立更多的修會及善會組織，推廣傳教的工作，一點也不因為受到迫害而退縮。教會肯定自己的信仰、竭力為保存信仰而付出的血汗及犧牲、堅持採用母語的勇敢行徑，都是慘受外敵游淪的波蘭人民有目共睹的。於是，在瓜分時期，教會可以說是給予散居各處的波蘭人民信心、希望、團結的唯一精神泉源，因為她正勇敢地、無間斷地代表著波蘭的文化傳統、愛國情緒及奮鬥的精神。

(5) 獨立的波蘭 (1916-1939)

大戰結束，波蘭經過一連串的國際會議及條約簽定後，便重現於歐洲的地圖。不幸的是波蘭仍然隱伏著很多危機。領導層人士雖然有相當高的愛國

情操，卻沒有實際的政治行政的經驗及責任感。來自三個不同的瓜分區域的政要，商人、知識份子、地主，基於不同的經驗及利益，會互相猜忌及不滿，這對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來說，是一大阻礙，給一個初嘗共和國及自由選舉制的國家，帶來更不穩定的政府及政局變遷。外交上，波蘭夾在野心勃勃的俄國及德國之間，威脅也相當大。

相對政府組織的發展來說，波蘭教會的發展是驚人的，由1918年至1938年的20年間，波蘭主教的數目由23名增至51名；到1939年，教會擁有250份以上的定期刊物；教會是全國最大財產擁有者之一；全國的大學設有神學系；教會的活動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教友組織的支持；超過4000個堂區附有社會福利服務。教會的發展其實有一個具體的實用性，就是彌補一個不穩定政府的不足，運用她的組織力量去推行教育，維繫人民及引領人民參與社會事務。

(6) 波蘭再次失去自主權

1929年9月1日德國攻入波蘭，10日俄國入侵波蘭，兩國再次瓜分波蘭。

波蘭東邊的土地被納入俄國的版圖後，當地的宗教宣傳立即被制止，神職人員及教友被當局指控或驅逐。

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在波蘭成立一個名叫General Gouvernement的統治機關，限制及壓制教會的活動，包括關閉教堂、修道院、學校及教會組織，甚至把不服從的神職人員及教友關進集中營，因而令教會失去一向以來參與社會福利的角色，更造成她在架構及形式上的崩潰。不過，事實上，一個萎縮的教會組織在波蘭人民的心目中更顯得

重要，因為教會正好代表著人民的不滿及呼聲，當時Cracow的大主教不斷向納粹政府抗議，要求當局改變其宗教政策，給予教會進行社會上的慈善事業；更重要是教會代表著波蘭人民的愛國主義及文化傳統，宗教禮儀是人民惦念波蘭獨立時代的標記，是對抗納粹政府的抗議行動，是人民愛國的表現。當時有不少地下團體繼續教會的工作，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會被視為愛國的英雄，受到人民的紀念及敬重。故此，教會雖然在架構上受到摧毀，却仍然給予受迫害的波蘭人民精神上的支持及鼓勵。對多災多禍的波蘭人民來說，教會忠於信仰的榜樣的確有她振奮人民意志的力量。

(7) 二次大戰後——共產黨還會容許教會的存在嗎？

63

自1941納粹德軍入侵蘇聯後，波蘭的流亡政府轉向與蘇聯談判，要求釋放被放逐到蘇聯內陸的波蘭人及戰俘，並在蘇聯統治下的地方建立一支波蘭軍隊，以為可以與蘇聯化敵為盟，一齊對抗德國，不過蘇聯一直都不擁護流亡政府，卻暗中扶植波蘭共產黨的壯大。1941年，戰前是非法的波蘭共產黨開始活躍起來，組織波蘭工人黨，與在蘇聯的波蘭共產黨員互相呼應，反對德國的統治及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其實一切都是蘇聯建立東歐共產主義陣形的安排而已，Gomulka 於1943年12月領導波蘭共產黨，組織地下政府，準備在蘇聯紅軍驅走德軍後便接管波蘭政治。

流亡海外的波蘭政府，沒有制止蘇聯勢力滲入波蘭，也沒有制止共產黨的發展，因為他們內部的政見不一，經常爭論有關邊界的劃分及對波蘭境內政府的態度問題。

在這種意見紛云的情況下，波蘭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其中包括共產黨及非共產黨人士。不過，共產黨在聯合政府裏佔有有利的位置，她懂得利用波蘭人民對德國的仇恨、流亡政府官員的分裂，去引援蘇聯的協助。同時，Gomulka 時常強調波蘭要走一條演進式、波蘭本地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會重覆蘇聯強風暴雨式的社會主義革命，藉此來增加人民對共產黨的信心。故此，共產黨在波蘭政治舞台上是一枝獨秀的。在 Gomulka 的波蘭本位化政策下，政府明白教會是一個現成的社會力量去幫助國家的重建工作，所以教會仍然享受一定程度的尊重。

不過，波蘭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一直受到蘇聯的監視。到1949，波蘭加入 Cominform，顯示已被納入蘇聯的國際共產運動的陣形內，Gomulka 在1948年因與南斯拉夫的鐵托採取和好的態度而要被迫退休，改由一個受莫斯科訓練的黨員領導共產黨，意味著親蘇勢力的抬頭。

所謂“新人士，新作風”，政府限制教會的活動，包括國有化教會的慈善組織，醫院及財產等，監管教會的司法權及工作人員，主使一些“進步的愛國”神職人員去破壞教會的內部團結，推動 PAX movement 來攻擊教會等。然而，教會的羣眾基礎卻沒有因此而沖散，反而支持教會與政府對立，藉參與宗教活動來公開表示對共產黨的不滿；教會堅毅勇敢的形象仍然存有。

1956年是波蘭政治另一個轉換點，因為 Gomulka 再次踏上政治舞台，繼續他波蘭化的社會主義路線。充份意識到蘇聯的威脅，Gomulka 認為波蘭若要保持獨立及自立，就要在一定的範圍內享受民主及指出改革，因為任何爆炸性的政治要求都會成為蘇聯介入波蘭的藉口。於是，Gomulka 的政策以改良為主，願意與人民磋商及妥協，並恢復與教

會的正常關係。

Gomulka 首先釋放以前被逮捕的 Wyszynski 主教，然後容許一份最有影響力的天主教刊物恢復以往獨立的出版權利，並批准教會有不受干涉的自由去進行宗教課程。政府與教會和好，因為教會是一股穩定國民情緒、團結國家精神生活的社會力量，可幫助 Gomulka 新政策的推行。舉一個例子來說，Wyszynski 主教與波蘭總理在1957年1月15日開會後，翌日便發表宣言，呼籲天主教徒“盡良心的責任”，參與20日所舉行的國會投票。這不表示教會已成為共產黨的喉舌，始終政府與教會在意見及價值觀上都有分歧，不過 Gomulka 政府透徹了解教會在穩定及團結社會方面的貢獻，才與她和好，以免因宗教的緣故而產生內部的紛爭。

三、結語

65

可以肯定，波蘭教會是一股有影響力的文化及精神力量，給多災多難的波蘭人民帶來希望、團結的象徵及鬥爭的榜樣。不過，這個結論不是以教會的行動的出發點做基礎，而是從歷史後果及効用來做根據的。換句話說，教會不必定以團結波蘭人民反抗外敵為行動的目的或信仰的實踐（因為我們手頭上沒有這樣的資料），但她卻有振奮人民的作用。故此，儘管教會不是一股有實權的政治勢力，但她與波蘭的政治命運是不可分割，她衛護宗教自由而作出的犧牲也是有其政治的意義及効用。

曾經有一位波蘭詩人，把自己國家比喻為“國家中的基督”（Christ of Nations），這正好象徵波蘭人民痛苦及奮鬥的經驗，及他們依賴基督復活的希望，在漫長的悲哀歲月中，一直掙扎到底！

「軍管下的波蘭， 教會可否有更 積極的角色」

譚余

66

(一) 導言

波蘭在軍管的情況下，一切民間組織肯定會受到鎮壓。天主教教會以其一直以來在波蘭的地位和影響力，似乎是一個可以有條件作積極貢獻的組織。

在波蘭團結工會的綱領中指出啓示工會的四個主要源泉是民族傳統，基督教的道德原則，民主的政治旗幟，及社會主義的社會思想。我們可以看出在波蘭這個超過百分之九十為天主教徒的國家來說，天主教對團結工會的成立有其一定的影響。雖然這影響有多深，是藉得我們探討的問題。在波蘭實施軍管之後，不論波蘭的天主教或我們的教宗亦曾公開指責此為一不人道的行為。但在這些指責以外，教會是否能有更進一步的行動？本文便希望從天主教在波蘭實際的影響及團結工會與天主教的關係來探索以上的問題。

(二) 教會與團結工會的關係

教會與團結工會的關係，可直接從團結工會所發出的一份給予各國工會的官方文件中看出：

“它獨立於任何意識形態或宗教之外。天主教信仰確實是工會內特徵之一，而且其影響也是深遠。這正反映出在一個大部份由天主教徒組成的社會中，人民在教會下特有之意識。但工會是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組織。它肯定基督教義是西方文化之基礎，但它的政治活動與政府無關，也沒採納天主教教義為規條。”

(Macshane, Denis. Solidarity, P. 96)

67

天主教給予波蘭人民一些傳統的價值觀念，教會亦是波蘭人民道德生活上重要的指標，但團結工會與教會在政治層面上是沒有關係的。同時它亦非跟隨與天主教有關的社會獻章而行。從行政上來說，我們相信團結工會是完全獨立於教會的。比如，在前波蘭大主教死後，有三個團結工會的代表在美國接受訪問。當被問及大主教之死對團結工會有什麼影響時，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指出主教死後對團結工會產生了什麼的改變，雖然他們都非常尊重大主教的道德指引。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教會是沒有直接控制團結工會，這兩個組織在行政或決策上都是獨立的。

但無可否認教會是間接上促成了團結工會的成立。一向以來波蘭教會便樹立起怎樣與國家互相抗衡的榜樣。這是給予團結工會莫大的幫助，因為教

會作為一個榜樣，使波蘭人民明白到他們是可能和怎樣組織起來與國家制衡。

另一方面，教會亦同時給予知識份子們一重要的交流機會。例如在波蘭各大城市中的“Clubs of Catholic Intelligentsia”。在會中，除了討論一些宗教問題外，各類問題如經濟、政治、歷史、文化都有所討論。同時知識份子們亦可以透過天主教教會的各報刊或期刊等互相交流。藉着這些機會，人們亦能學習到怎樣組織小組討論或編輯部門。在團結工會成立以後，有很多這些知識份子都轉向團結工會去給予他們幫助和意見。

(三) 天主教對波蘭的影響

68

在波蘭這個絕大多數信仰天主教的國家，天主教無異是波蘭人民精神方面的主要支柱。但到底這股精神力量能有多大的作用去支持波蘭人民的運動呢？或波蘭人民的運動又有幾多成份是受這精神力量所推動呢？我們相信這是很難衡量得到。雖然我們不能否定這精神力量的存在。同時這股精神力量在具體事情上產生的影響力亦是很難測度得到。當團結工會的成員大多數為天主教徒，這並不能告訴我們他們在處理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會有什麼決定。因為在傳統的基督教裏，我們雖然有很多基本的價值觀念，如真理、和平和正義。而很多時這些價值觀念已潛移默化地存在於信徒心中，成為信徒堅持的信念。但它們都只是一些抽象的價值觀念，而絕非一些具體事情的指標。因此我們雖然承認波蘭人民這股精神力量的存在，却無法從具體的事情上作出衡量。教會與團結工會在行政和決策上無異是兩個獨立的組織，而我們却不能否認教會在精神層面上那潛移默化的影響。

(四) 在軍法統治後教會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人都相信在軍管以後，波蘭教會便成爲了政府與工會溫和派有所對話的主要橋樑。但教會只是橋樑，而非有權力左右任何一方。而教會所扮演這種緩衝作用，對工人來說，是有利的。因爲這樣可避免任何一方走到極端，同時亦使工人能爭取更多的時間。在國際方面，時間的積聚，可給予關注波蘭工運的人更多時間預備。

在軍管以後，在華沙的聖約翰大教堂中，現任波蘭大主教Josef Glemp便公開指責這次軍法統治是不合道德和不正確的。在這次的批擊中，天主教教會是站在一傳統的立場對壓制人權和自由的政府作出抗議。大主教是希望教會能在政治鬥爭上，試圖防止激進的暴動，因爲這是有可能導致蘇聯的入侵。雖然在各方面的強烈要求下，大主教亦公開指責政府這次不道德的行爲。但在波蘭這次危機中，我們亦不難想像得到有些波蘭主教或神職人員是希望教會有一更積極和具體的戰鬥性角色。那麼教會是否能在未來的日子中扮演一更積極的角色呢？

69

(五) 教會在波蘭採取更進一步行動的可能

面對着團結工會，面對着軍法統治，教會實在已經正式及非正式地表達了她的立場，發出其先知的聲音。至於教會可否有更積極更激進的角色，比方可否利用其在波蘭已有的影響力，整體組織起教徒，向政府當局施加壓力，用行動來支持團結工會，更徹底更積極地負起教會在波蘭的使命；則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覺得若教會採激進角色至少可以預見三個困難：

(1)單以宗教理由不足以號召全國

正如上面已論述過雖然波蘭是天主教國家，但究竟這股精神力量能有多大的作用去支持波蘭人民的運動，實在很難衡量。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天主教在波蘭歷史中一直受到重視的原因，除了是出自波蘭人的宗教熱誠外，我們不能否認其他重要的原因是天主教實為波蘭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所以維護天主教信仰實際上是維護波蘭文化。在亡國時期，波蘭人民堅持天主教信仰實際上亦是一種愛國的表現，天主教在當時扮演了維繫波蘭人民、保存文化和國民身份的角色。明瞭此便不難明白天主教在波蘭受到廣泛接納的原因，其中愛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宗教在波蘭並不是純粹的宗教問題，若果我們要求教會的純粹宗教理由作號召，去扮演更極進的角色，我們便很有理由去懷疑這個做法之可行性。

(2)殉道式的激進角色非人人能承擔

要求教徒與一個壓迫的政權正面強烈對抗和衝突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要求。從歷史的經驗可知，當初期教會受壓迫時也不是人人能夠站出來殉道。即使是我們的主耶穌親自訓練的十二位宗徒，到耶穌受害的關鍵時刻，也沒有一人能堅持信心，站在耶穌的一邊。這正顯示了人罪性的後果。正如保祿宗徒說過：「我有心行善，但實際上却不能行善。」（羅、七：18）。我們不是在懷疑波蘭信徒的認信程度和宗教熱誠，我們只是面對現實，正視人罪性的一面。所以，要以教會作為一個鬥爭的單位實在是不切實際的一個要求。我們不相信單憑神職人員的一番號召教徒就會奮不顧身為宗教信仰中的公義人權的理想去投身。

(3) 單靠宗教熱誠不足以行事

我們可以肯定軍管是絕對不符合信仰的精神，正如波蘭的大主教和我們的教宗也公開宣示過不少。這方面信仰的立場是絕對肯定的。反對軍管，支持工會是教宗的結論，也應該是每一個信徒贊同的結論。但是，如何反對？如何支持？則又非單是一個價值取向的信仰問題，而是一個實際行動和策略的問題。所以單靠一股宗教的熱誠是不能解決問題。

若我們要求波蘭信徒單憑信仰的支持去與政府對抗，是天真和衝動的要求。站在信仰的立場我們清楚反對軍管；「但如何反對就超出了宗教的範疇」。首先，如何參與決定於我們採取什麼的社會分析。如何分析？如何組織羣衆，採何種對策與政府對抗均非宗教的範圍，而需要其他的專業知識如社會學、政治哲學，足見宗教信仰不能提供具體行動綱領，換句話說，單靠宗教信仰不能行事。

71

(4) 結語

以上的討論是希望指出當我們要求波蘭教會在軍管下扮演更激進的角色時所必須遇到的困難。我們這樣論述不表示我們同意現時教會所做過的一切——發聲明、表立場已足夠，若然單就效果說，教會所做的可能是於事無補，沒有帶來什麼具體實際的成果。但是教會作為一個現存的宗教組織，特別是一個以神職人員帶動的組織，根據以上的論述若要扮演更積極的社會角色又似乎不可能。有形、組織的教會似乎一片灰暗，無可作為。關鍵應該在擴充「教會」的意義。教會是信徒的教會，當我們

要求教會要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時不一定指制度的教會或神職界領導的教會。事實上每個信徒都必須因應各人的才具各人的恩賜在不同的崗位上去負起信徒應有的責任。有政治才具的信徒大抵可以組織羣衆，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來實踐信仰，如何實踐是每一個信徒存在的決定，教會的希望却是在他們身上。當他們決定作更大的投身，從而對信仰有更新的體驗，創造出新的神學，也就同時擴闊豐富了天主教信仰的內容。

波蘭傳播媒介 的鬥爭

by Andrew Swidlicki

在近十年中，來自東歐的重要文件之一的〈共和政體國家及其修正途徑的報告〉（*The Report of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and Ways to Rectify it*）中指出波蘭傳播媒介在功能上的失效是造成國內不安情緒的重要原因。傳播媒介失去信譽是與領袖們不被信任有關連；同時亦反映出整個制度在功能上的不健全。政府的宣傳方式和審查尺度時常改變，同時爲了政治理由將一些傳播職位派予給不適當的人。政府將傳播媒介當是控制人民的工具。羣衆的意見並不能夠由國家所控制的媒介來傳達。波蘭人對於新聞都抱着習慣性的懷疑和不信任態度。據編輯這份報告書的編委小組的意見認爲：波蘭的傳播媒介就連作爲當權者和人民交流的工具的功能也未能達到，其他的功能更不用提了。

73

從長遠來說，這樣的情況對黨本身是有害的，因爲它不能知道社會中的真正感受。而基本上傳媒是可以反映現時社會中的路向。在蓋萊克（*Gierek*

譯者按：本文發表於 *Telos* no. 47, 1981

）時期（1970 - 1980），「成功的宣傳」是那期間的標準。宣傳的主要目的是令國民感到國家現在正處於一個工業急劇發展的時期，但事實卻剛好相反：消費者的期望落空，多種生活物品匱乏，而且國家欠下很重的外國債務。在蓋萊克下台，卡尼亞（Kania）接任為黨的第一書記的幾個月以來，傳播媒介採取了相反的策略，致力描述波蘭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獨立的工會如團結工會相繼出現。這兩件事情都有密切的關連。八零年夏季的罷工浪潮顯示出人民對共產制度的不信任，震動了整個黨，以致波蘭共黨不能找出一挽回人民信心的計劃。他們不單沒有找出解決危機的長遠方法，反而依靠宣傳作出各種攻擊，指責團結工會的領袖、工會的顧問和那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另一方面，團結工會作為一個擁有一千萬會員的組織也不能在全國性的報章、電視或電台等發表意見。就是獲得批准，內容也先要由政府方面審閱。兼且政府方面並未有完全實行與團結工會達成的協議。因此對傳播媒介鬥爭便成了一項極之重要的目標。

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卅一日，由政府與工人罷工委員會在格坦斯克船廠所簽訂的協議中的一項精神就是要提高傳媒對社會關注的事情的靈敏性。協議准許新立的獨立工會有自行出版權。政府亦答應制定一套新的檢查法制，而且許下諾言在三個月內提出較適當的法制給議會通過。團結工會和政府雙方都同意當報章報告有關政府行政機構的活動時應比以前更詳盡，同時亦應公佈更多官方文件。而不同的宣傳工具如電台、電視、刊物和國家出版局等，都不應繼續操縱民意，而應反映不同意見。傳媒亦應受社會的管制。在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一日的卡

土瓦斯 (Katowice) 鋼廠所簽署的協議中的第三點使清楚說明傳媒應受社會管制的意見。協議訂明新工會有權在傳媒宣傳他們的活動，佔用的時間或篇幅亦要合乎該工會的人數。此外新工會的代表亦獲准在傳媒中出現。

在簽署「格坦斯克」協議之後，所謂黨和社會的「對話」便開始了。新的領導層希望以改革的承諾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但波蘭人回憶起以前類似的經驗便諷刺地評論說：「又是另一樽新瓶舊酒」。

。雖然共黨領導層承認自己的無能和敗壞，但他們仍未能夠也不願意去推行一套徹底解決國家經濟危機的計劃。更遑論將這套計劃交由人民討論了。嚴重的分歧和權力的鬥爭在黨的領導層出現。從前不被人民信任的工會組織都成功地變為獨立、自治並由舊領袖帶導的組織。這時政府推翻團結工會能夠利用傳媒的承諾，而工廠管理層則試圖阻礙新工會成立。於是罷工成為迫使管理層遵守協議的認可方法。但分裂逐漸不只在共黨中而且在團結工會亦出現了。一些加入新工會共黨低層幹部要求工會尊重共黨的黨規。有些新加入的會員則覺得被那些從未加入共黨的團結工會會員忽視和懷疑。黨和工會間彼此都不信任，又在缺乏足夠交流的途徑下，要互相取得妥協是非常之困難。因此當有新危機出現時，雙方往往為了避免正面的衝突而在最後一分鐘才勉強達成協議。在最後一分鐘，希望能全面將形勢扭轉。但雙方為了解決當時危機而定的措施後來都沒有履行。這樣造成了雙方對妥協都不滿意。慢慢地新的抱怨又出現，事情又再一次循環。傳媒曾試圖更進一步介定「格坦斯克協議」中所指的「社會合約」。但在這次對話中，除了幾份本地報章外，

團結工會的聲音便根本聽不到。團結工會的意見只發表於一些印刷惡劣的工會內部刊物中。因此早在團結工會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由波蘭最高法院註冊之外，爭取運用傳媒已成了工會的一項重要目標。

由獨立工會創辦委員會 (*Founding Committee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發出的一份文件指出了確保遵守「格坦斯克協議」所需的法律保證和各獨立工會、國家以致黨都必需締造的基本條件。文件認為其中一重要條件就是經濟和社會生活上能全面開放。換句話來說，傳媒現在處理消息的方法便一定要改變，好使在解決危機的路途上能有真正的公眾討論。

76

在前些時候，工會行動派都發覺很難傳遞消息和組織上有混亂的情況出現。很多時，混亂的產生都是由於官方試圖支持舊有的工會組織和阻礙新的組織。同時政府又不斷發表一些有關經濟損失的驚人數字，並且指出這是由於不負責任的罷工所引致。由於團結工會的存在和其活動都完全被傳媒所忽略，團結工會便覺得有需要成立一些不用受檢查和與外界有所接觸的印刷組織。令人非常高興的就是在這段期間，團結工會的地區分支都能維持其它聯繫途徑，使能喚起在全國各地有完備組織的警告性罷工。

在八零年夏季的罷工中，工會的出版以新的會報出現。工會印刷組織的主要角色是為傳播最新的消息和公開工會的生活。有很多的刊物已有其特別的姿態，但對共黨領導會的批評還是有限。原因是由於團結工會首要的任務是要建立一穩固的組織架構，而完備的出版設施是非常重要的。當時對工會多數的刊物都是由很簡陋的機器所印行。團結工會

的經濟並非差到買不到東西，只是在波蘭團結工會根本便買不到一些基本物資。西方先進的印刷工具在波蘭是不易獲得，縱使得到也無從找到零件和維修的人員。從團結工會在華比治 (*Walbrzych*) 支部的經驗中，可明白到工會會員不能夠同時用國家所管理的印刷局，而又能保持其獨立性。當他們試圖用政府的設備時，檢查官便要求一些不可以被接納的更改。除了檢查問題外，國家的保安部門亦不斷地製造困難。在波蘭東北的舒或期 (*Swwalki*)，團結工會的地區分支並沒有任何印刷設備，因此他們便利用擴音器、揚聲器等工具。每日下午三時至六時的三小時中，在團結工會所佔據的一所樓房的窗口上，播出有關團結工會公報的錄音聲帶。當地的警務人員都曾試圖沒收那些廣播設備，但不成功。

在新工會勢力比較強大的地區中，比如在格坦斯克等地區，偶然在本地的報刊中亦有關於工會的簡短報導。但不久，《波士的日報》 (*Baltic Daily*) 的編輯和團結工會便起爭執。《日報》的編輯停止刊登某些關於工會的消息或將內容改了才見報。就算官方答應給予團結工會運用傳媒，但這些承諾是隨時可以推翻的。此外官方雖在原則上答應工會運用傳媒的要求，但工會每要力爭才能真的在全國性報章或廣播系統上發表消息或意見。在爭取團結工會註冊的兩個月機危中，新的工會代表還是不准運用傳媒。而且爲了縮小新工會的影響力，當權者便直接與那些已不能代表工人勢力的舊工會代表協商。團結工會號召全國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三日作一小時警告性的全國大罷工是因爲政府對工人加薪的要求遲遲不予答覆，拖延團結工會的註冊

，繼續壓止工會運用傳媒的權利並且以對拒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藉口來打擊新的工會。在一九八零年十月六日的決議中，團結工會的全國性諮詢委員會向波蘭總理雅魯譯爾斯基提出以下幾點的要求：

- (1) 工會應准許出版其每日全國性的報紙，每一版所印行的總數要與已經瓦解的官方中央工會議會所出版的刊物 *Głos Pracy* 一樣(即為五十萬份)。而以後還可以增加。
- (2) 地區分支所出版的刊物數量應決定於這分支的組織大小。
- (3) 應准許工會出版書籍和冊子。
- (4) 在全國性的電視廣播中，團結工會至少要佔用十分鐘的時間，在地區性的電視廣播則為二十分鐘。至於電台的廣播則為四十五分鐘。

78

全國性諮詢委員會 (KKP) 的決議中亦包括要求團結工會的公報刊在全國性和其地區性的刊物中，而且要有一獨立的專欄由團結工會的人員編輯。此要求代表了與現存的檢查制度的決裂。這決議中同時亦要求在電台和電視中有一獨立的專責部門來預備一小時有關工會事務的節目於每星期播放一次。

傳媒沒有報導有關新工會的發展的原因是因為黨領導仍不知怎樣處理這些事情。在迫近一小時警告性全國大罷工的日子裏，傳媒又發動了一宣傳活動，希望人民相信團結工會為促成社會不安和使經濟陷於混亂。在馬索期 (Mazowsze) 地區的團結工會在其第一次出版的報導 *Miezaleznosc* 回答說：

「我們對在格坦斯克 (Gdansk)、史薩先 (Szczecin)、鄔塞比 (Jastrzebie)、卡士瓦斯 (Katowice)

鋼廠與我們簽署協議的政府代表有信心。但工人們却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因組織工會而失去工作。他們的擔憂是爲了各刊物和電視仍然絕口不提團結工會的存在和活動好像這些是莫大的禁忌。」在全國性諮詢委員會 (KKP) 所公佈的文件指出，在「格坦斯克協議」的簽署過程中，工人罷工委員相信政府方面的誠意，作了很多讓步而且任由政府選擇履行協議的途徑。反觀政府方面却經常食言，而且運用諸般手段恐嚇工會人員，特別一些在政府機構任職或軍方民事工作服務的工會人員。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團結工會在最高法院的註冊，給工會帶來合法的地位，但却不能停止傳媒繼續散播錯誤的消息。在另外一份針對這個問題的聲明中，全國性諮詢委員會 (KKP) 主席華里沙指出，傳媒中那些有關最高法院決定的消息是「不清楚」及「不完整」。於是，政府和團結工會雙方的代表在一九八零年十月卅一日的會議中，團結工會的發言人要求政府供應紙張，讓公會可以印刷一份週報，用作廣泛的流傳；並要求工會可以在電台及電視台主持每週一次的節目，而政府在編輯過程中的監察就只限於技術性的問題方面。工會代表保證他們的出版活動會符合工作非政治化的性質、爲爭取工人福利及尊重法律而工作。其實工會代表已放棄原來的要求，把辦日報改爲辦國報。政府也保證會提供所需的物資及技術協助，並在短期內草擬有關工會刊物的規則。

既然團結工會打算用任何代價保持爭取運用傳媒一事的性質並不是政治化，於是重心便不放在新聞管制方面——因爲它本質上是帶有政治性的——反而是集中在改善消息的流通來解決當時的危機。

可是，儘管經濟情況一直在惡化，但根據馬索斯（*Mazowiec*）地區的團結工會指出，直至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為止，「有關這些問題的客觀消息仍然不可以獲得到」。反而，接二連三的呼籲都要求團結工會方面應該表現得較為溫和，有些例子甚至邀請工會與執政的波共為國家的命運共同分擔責任。傳媒宣稱國家經濟崩潰是由罷工造成，但是團結工會却認為是由於幾十年的忽視所造成。當局的目的包括兩方面：1）製造公眾對團結工會的不滿2）在一個溫馨的擁抱中把團結工會窒息。

就著共同分擔責任的要求來說，團結工會的立場是十分清楚的。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是沒有共同分擔責任的可能的。這一點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整個有關應否在星期六工作的討論過程中，是表露無遺。續漸實施每週工作五天本來是格但斯克協議的條款之一，但當局却認為國家不能提供每週工作40小時的條件，而單方面推行自己的建議。對團結工會來說，這樣的決議方式比決議本身更不能接受。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的聲明指出，在那些對工會會員有影響的重要事情上，工會應該有權得到政府的諮詢。該份聲明指出政府對團結工會日趨明顯的敵對態度，列出不合理的新聞管制，對團結工會的攻擊和羈留政治犯等等的問題。當時政府取得一次宣傳的勝利，把公眾的注意力從執行格但斯克協議轉到應否在星期六工作這些相對上是微少的問題上，團結工會在一月廿八日的宣言便突出當局在處理應否在星期六工作的問題上，是採取一次「妄自尊大的宣傳運動」並且明顯地指出，加強新聞管制使得爭取運用傳媒的問題更形迫切。在一個互相猜疑的氣氛下，團結工會宣佈在二

月二日將會發動一次長達一小時的警告性總罷工，爲要爭取三個要求：運用傳媒及限制新聞管制；工人就算在星期六不理會政府的命令而不上班也應該得到薪水；個別的農民有權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團結工會與政府雙方面談判到最後一分鐘才避免罷工的爆發。團結工會反復要求地區性及全國性的電台及電視台定期轉播工會的節目。政府回答電台及電視台已經充積著評論性及團結工會的新聞，故此工會已經可以說是有運用傳媒。工會代表卻反駁，說播送有關團結工會的評論是一件事，讓她發表自己的意見又是另一回事。另外，團結工會在傳播媒介中受到指責，認爲她是國家改革出現矛盾的導火線。大家就一些問題達成協議。結果，全國性的團結工會報紙的總出版量決定是五十萬份；電台及電視台播送有關團結工會的立場的定期性節目時，要得到工會新聞發言人的認許；就一些影响工會會員的重要事情，如新的經濟計劃或經濟改革上，團結工會有權發表她的意見；一個由工會代表預先審閱的每週性有關工會的節目會在電台及電視台播出。

81

團結工會的代表團與政府的「電台及電視委員會」主席，史志羅巴力基 (*Zdzislaw Balicki*) 原定於二月十七日繼續就這些節目問題舉行磋商。可是巴力基不贊成團結工會代表團的參與，結果會議未有如期舉行。正如團結工會的新聞發言人，加魯莫車史基 (*Karol Modzlewski*) 所說：「團結工會不得不指出巴力基的表現是一種顛覆的行爲，因爲他破壞了工會和政府雙方達成的協議。他的做法推翻政府在一星期前的明確決定，因而令最高的行政組織顯得滑稽可笑。」當雅魯澤斯基當選爲新總理後，巴力基肯接見團結工會的代表團。中央委員會的宣傳主任，約瑟嘉沙 (*Josef Klasa*) ，在一次

對經濟互相委員會 (Comecon committee) 的外國通訊員的演講中承認，很多的傳媒，特別是電台，跟政府的關係不甚好因為很多傳媒的技術人員是團結工會的會員。在同一的演講裏，他還指出團結工會不能夠在電台，報章及電視台有任何的影響力。雙方在二月十九日所舉行的討論也沒有達成一個完整的協議。不過，雙方卻協定，如果電台或電視台轉播的消息未獲得團結工會的同意，便會如實向觀眾交待，電台及電視台同意廣播與團結工會代表一起進行的討論會約人次，每次則存一小時。同時決定四月中重新舉行談判的日期。

到這個階段團結工會爭取運用傳媒的結果還是不明確，同時也不能肯定是後會採取甚麼形式。當局不懂得如何與團結工會相處，因而在間歇的對抗過程中，當局會本能地使用暴力，而團結工會也會用罷工以予阻嚇。政府與團結工會之間溝通的途徑是不穩定的，多是為了避免當前危機變得更惡劣。不管團結工會如何用以非政性的姿態爭取運用傳媒，其性質明顯地是有政治的意味。意識形態上的規條雖然在波蘭已經沒有人會重視，但其昂貴的門面功夫若再遭受嚴重的破壞時，黨也許會失去其對社會創制權的控制，同時國家行政也會喪失其保密的氣象。

罷工對當權者是一個重大打擊。波蘭聯合工人黨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ZPR) 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工人黨，公眾輿論認為它要對當前的危機負責任。黨本身出現嚴重的分裂，所以她很難對新的工會給予直接的打擊。因此只好改而攻擊「反社會主義力量」，目的是把危機歸咎在一羣人身上，因為他們坦率的言論及活動令當局非常尷尬。嘉沙曾說明黨與社會之間的對話不能容忍那些不可能接受的人。對團結工會的積極份子來說，可

供選擇的方法是一目了然：只要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的顧問委員會②一天參與組織新的獨立工會，當局就不會應允團結工會的要求。當局的策略是要將團結工會分成「好」的和「壞」的，與工人自衛委員會保持關係便是「壞」的工會。

工人自衛委員會的會員大部份是工會的顧問。他們在團結工會內是扮演著一個溫和的角色。他們有時會與當局談判。他們在工會內的影响力從波共覺得需要譴責他們為「反社會主義」力量這點便可見一斑。

工會的積極份子認為打擊所謂「反社會主義力量」的宣傳運動，會打擊團結工會非政治化的性質。當局嘗試把官方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團結工會，及影響工會選擇職員。最終目的是威嚇工會會員及迫使他們作公開的政治聲明。從一份由馬索斯地區的團結工會揭露、名為「起訴非法的反社會活動的參與者手則」③的秘密文件，可以肯定上述的說法，顯然當局要把新的工會與持不同的意見的人一起處理。這份文件揭露當局對工會的態度是虛偽的，文件由總指控處制訂，分發給各區的指控官用來證明獨立工會的成立是反社會主義活動的一個直接後果。此外，文件建議採取非法的手段，如搜查私人住宅，充公未曾檢查的獨立刊物作為實物證據，證明逮捕民主反對派是正確的。其中的涵意是清楚的：未經檢查、獨立的出版事業是推翻制度的一種準備工夫。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當局在華沙宣佈工人自衛委員會已被調查。團結工會內的工人自衛委員會會員及其他未點名的「極端份子」同時受到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的猛烈批評。華沙有人推測，當局不但嘗試謀求工人自衛委員會與團結工會之間的分裂，而且還會利用緊張的局面來製造團結工會與廣大羣

衆的分裂，當罷工爆發後，便給團結工會扣上造成國家經濟不景及短缺的罪名。

卡高(*Krakow*)的學生認為當局的決定是一種帶有病態及接近瘋類的行爲。自格但斯克協議以來，已經總共有八個人被捕，反映出言論自由，合法性逮捕、尊重法治等協定的弱點，更重要是揭露當局在執行上述條款時的基本憤恨。

警察及保安部隊在波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構成黨機器中一個強大的壓力團體。正當罷工瀕生，黨的士氣受到挫折，領導高層出現變化時，內部保安機器的穩定便更爲重要。正如三月的比哥斯(*Bydgoszcz*)事件所說明，儘管警察觸犯嚴重的錯誤，也會得到當局的寬恕。格但斯克協議所保證的言論自由，並不是一個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約制，例如刑事法典第276條便是指控那些進行秘密出版活動來迴避檢查制度的人。在團結工會未能運用傳媒之前，便只有當局才可以表達其意見，所謂黨與社會間的對話也會變成單方面的獨白。

波蘭官方的新聞檢查制度是用「新聞、出版及表演控制總處」(*GUKRPIW*)的形式出現，非正式的檢查制度是一連串的預防性措施。後者比較難加以界定，但它的存在是明顯的。非正式的檢查員從根源著手，去壓制不稱意的觀點。先發制人的檢查員是處理科學及文化創作的專橫行政官。先發制人的檢查制度帶來的問題與運用傳媒的問題是相關的。若果傳媒不能民主化，就是法律限制也不能改變新聞管制的面貌。「新聞、出版及表演控制總處」所出版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新聞管制的黑名單」中顯示，被禁出版的資料甚少是有關意識形態的，而是包括那些諸如環境雜誌、咖啡消耗量、海外牌照的購買、開礦災難及其他無數類似的例子。

新聞管制的一個重要的能是使波共有迴旋餘地。波共即使在計劃、投資、社會政策上犯了錯誤，新聞管制也可以使之不為大眾所知。華沙的新聞從業員為了自己工會的自主性，提出了防預性新聞管制的問題。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一日，他們在長達六小時的會議上，批評他們工作上的制肘不但來自制度化了的新聞管制，更來自波共的機構與編輯。數星期後一九八零年十月廿九至卅一日。在華沙舉行的三天時間會議上，波蘭新聞從業員協會(*The Union of Polish Journalish [SDP]*) 的代表強烈批評導致他們專業聲望空前低落的工作和組織狀況。修改法例亦只不過是令新聞從業員「覺得」自己是當局的拍檔，而不單純是宣傳機器中的工具。

二月十三日，SDP新選出的主席史提凡·伯賴高斯基(*Stefan Bratkowski*) 與波共政治局強硬派的要員史提凡·奧索斯基(*Stefan Olszowski*) 在華沙會晤。但這次會議並不能彌補雙方互不信任的鴻溝。伯賴高斯基提出新聞從業員的目的不是要從波共對傳媒的管理中掙脫出來，他們只不過是希望傳媒完成其基本功能。黨對傳媒的舊式控制，剝奪了傳媒的可信性。而在報章，電台，電視缺乏大眾信任的情況下統治一個國家，那是不可能的。新聞從業員坦白地要求權力去提供關乎輿論的全面資料及消息。奧索斯基卻回答說國家領導人只準備冷靜，逐步地推行改革，而不想受到「不負責任分子」的左右。據奧索斯基說，輿論帶來太多要求。雖然真實的資料與消息是改革的必要條件，但資料與消息也不能全不用按語或解釋而出現。

在新聞從業員以外，作家也是要每天跟出版檢查官作戰。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華沙作家協會

召開核心會議，發表了有關文藝文化現存危機的「意識形態的聲明」(an ideological) Statement)。聲明中有一項要求清楚界定出版檢查官的法定權力及責任。另一項要求授權與文藝文化部，使之能豁免某些文學作品受 GUKPPW 的管制。作家亦批評當局將文化「工具化」及貶逐不聽命的作家。幾年以來，作家協會的委員都要求政府改變其握殺「創作自由」，枯竭「國家文化傳統」的文化政策。他們也要求新聞及出版物管制受制於正規之社會控制。

新聞管制問題的公開討論是馬利安·霍先斯基 (Marian Falsinski) 掀起的。他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五日的律師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認為替新聞管制擬定法例，第一點要考慮的是社會大眾獲得全面及準確消息的權利。要做到這一點，有需要設立一些社會控制制度以對抗濫用權力。霍先斯基提議了一套推翻新聞檢查員決定的上訴程序。格但斯克協議要求政府在三個月內提出新聞管制的草案。結果，並沒有辦到。當立法部終於提出了一些法案，便立刻招來抨擊，說它根本沒有改變現存的狀況。受草案保護的利益太廣了，它所用的字眼又太含糊了，政府在新聞管制上的權力仍是原封不動。政府提出來的草案也許有一點改進：人們有權對新聞檢查員的第一次決定進行上訴。因此，團結工會全國諮詢委員會 (The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mmission [KPP]) 便批評說：「立法部提出的計劃並沒有增加出版和新聞自由，亦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證以確保新聞管制會合法地運作。故此，它不能說是符合了格但斯克協定的條約。」

對工會會員有莫大重要性的是團結工會出版的通訊和消息單張是否也受到管制。政府的草案只豁免了對消息單張的管制，對通訊則不然。工會宣稱

通訊不能視作一般刊物，因為它並不透過國營的報攤與閱讀室散發開去。自從一九八零年九月，團結工會的刊物並沒有受到管制，但當局並沒有正式豁免對它們的管制。政府與工會間也沒有甚麼正式協議。在某些地方(*Czestochowa, Walmszych, Jelenia Gora*) 政府明令禁止這些刊物。

團結工會的兩份全國性報紙：在史薩先(*Szozecin*) 出版的“聯合報”(*Jednosc*) 及即將在華沙出版的“團結報”(*Soliderrasc*)，都要受到新聞管制，因為它們都借用國營的印刷設備。聯合報不算是KKP的正式代言人，也不受KKP的控制，但聯合報的編輯與團結工會的主席團有密切但非正式及非制度化的聯繫。因此現在也搞不清聯合報是否一份獨立的政治報刊，藉團結工會引發

87

的社會更新情報而活動，還是在團結工會正式控制以外，為團結工會的目標服務。

遲遲未出版的團結工會周刊“團結報”帶來很大的期望。根據團結工會與官方代表的協定，團結報可以發行五十萬份。版數最先是24，後來減至16。團結報的編編輯麥索瓦基(*Tadeusz Mazowiecki*) 在華沙理工學院，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的會議上說團結報需要全新的出版形式，為的是使內部不同的觀點得以協調。團結報的主要工作不是提供消息(這是地方通訊的工作)而是引起大眾討論工會面臨的種種問題，若團結報每周定期出版，衆多地方通訊的前途則堪虞了。當局會持著團結工會已有全國性周刊，其他刊物都成了多餘為理由，盡量壓制地方通訊。

與當局談判中，團結工會獲得一個可貴的盟友：國營印刷廠的工人和技術員。他們自己的全國性

會議已於一九八一年二月卅一日在史薩先(*Szezeccin*)舉行，他們自己主動地站出來。爲了公開當局的新聞管制決定，他們運用圖案標記(以四個句號組成一個四方形)，標誌被刪去的段落，又反對出版一些扭曲團結工會立場的資料。團結工會的印刷工人宣佈二月十三日爲「沒有報刊的一天」以支持工會的兩項主要要求：運用傳媒及減少新聞出版管制。一天之前，下史拉西亞(*Lower Silesia [Wroclow]*)有類似的罷工以求釋放一個政治犯。該項罷工原先是公共交通工人計劃的，唯恐對市民造成太大不便，便改由印刷工人執行。面對這樣的發展，新聞檢查官便要改變一下他們的老法子。管制的責任及工作轉移到編輯身上去。爲了愚弄欺騙印刷工人，新聞檢查官要編輯刪去某些段落，理由裝成是爲了改正文體，版面不夠等。總之造成這些刪改是編輯需要的。於是不肯屈從聽命的新聞從業員發覺他們的稿子越來越不像樣。

要當局放棄與社會溝通的常規模式，不是不可能而是十分困難。這模式便是新聞出版管制及將傳媒變成宣傳工具。新聞管制不單用以防止人們批評黨的政策，更要造成黨方面不會犯錯並享有人民支持的假象。但要維持這樣的神話，在民衆中固然不可能，即使在波共黨內也一樣不可能。波共和團結工會都知道新聞管制問題具爆炸性。這一問題不單局限於不滿的知識分子。盧笛滋(*Lodz*)的學生和雷薩索(*Rzeszow*)的農民同樣要求訂定法律限制新聞管制。雷薩索的農民在他們的宣言中反對學校教科書提供虛假的歷史。

在組織獨立工會時，工人要求當局履行它在罷工停息時許下的讓步諾言，放寬新聞管制，容許社會所有人發表意見。這是建立社會溝通(*Social*

(Communication) 制度的第一步，通過這制度，公眾可監督政府，並向政府反映他們對政府決策的真實反應。可是，波共却沒有打算接受輿論的關注。當團結工會指斥政府沒有履行格但斯克協議的條約時，政府反而指責團結工會為一個潛藏的反對黨，一個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避難所，反革命的工具。傳媒亦附和著波共要求溫和號召，造成一個印象：團結工會只為了私利而組織罷工。雖然蘇聯，東德和捷克向波共施壓力，波共也不能抹煞在格但斯克協議許下的讓步諾言。因為公眾是這次協議的見證人。

團結工會除了要處理一般工會事務，如工資、職業、工作環境等外，它還要處理傳統上工會不理會的事務，而且團結工會更要將這些非傳統工作放在首位，因為今天的波蘭沒有其它組織有類似的實力和影響力去處理新聞管制，政府公安部門違法，個體農民權益，政治犯等問題，團結公會面臨的危機是人們對它寄以過大期望，工會並非萬靈藥，它不能恢復政府與民眾間的均衡。在今天的波蘭，地方工會的刊物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無論它們是油印小報還是大報，它們都反映了團結工會的多元性格。只要地方工會刊物一天還獨立，團結工會是不愁受機會主義者操縱的，在卡土瓦斯 (Katowice) 鋼鐵廠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會刊物會議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四至廿五日)，大家都同意編輯只對工會通訊的內容負責，而工會通訊並非地方行政的機關報。除了提供消息資料外，地方工會的刊物監察工會領導人的工作。團結工會的全國性週刊可能也有類似任務，但地方工會的通訊可以更勝任，因為團結工會的全國性週刊只反映一種觀點，但數以百計

的地方工會通訊則代表了很多不同的觀點。因為新聞管制仍存在，團結報是不能無條件地獲得新聞自由的，但地方工會的刊物實際上不受管制，中下層的團結工會會員可以有機會發表意見。這些小報能對國家控制的傳媒給以致命打擊，一如聖經裏的大衛擊倒巨人。

註釋

- ①快將由美國 *M. E. Sharpe* 出版社出版。
- ②工人自委會成立於一九七六年，目標是對參與當年反糧食加價暴動的工人提供藥物，糧食及法律援助。自委會有三十五個會員，二百個輔助會員。
- ③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的 *London Times* 刊登了全文。
- ④參看 *Telos no. 38*

香港報章裏的 波蘭事件 老成

報章的頭條新聞

繼56年、70年及76年三次的工運後，80年8月，波蘭又爆發了波瀾壯闊的工人運動。糧食加價直接激起了工人罷工反抗的浪潮，並迅速蔓延至全國。這股浪潮首先逼使統治階層改組，繼而將反加價的消費性要求，轉變為經濟以至政治方面的改革要求，成為舉世觸目的事件。結果，工人不但在加薪及改善社會福利的要求方面取得官方的答允，更獲得組織獨立工會及罷工等權利。此後，團結工會領導下的工運及國際的反應等，還「斷斷續續」地成為本港報章的關心對象。直至最近，在工會不斷提高的政治要求下，軍人領袖雅魯澤斯基悍然兼集黨、政之權，並對波蘭人民實施軍法統治以後，波蘭事件便再次成為本港報章主要的報導及評述對象了。

報章是本港最重要的新聞媒介之一，也是擁有最大讀者羣的文字媒介。它的報導、分析及評論，直接影響廣大市民對於波蘭事件的認識及態度。不幸的，許多「大報」都有頗為嚴重的局限和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便是指出和分析這些問題；希望報章讀者能建立批判的閱讀方法，以免受這些弊端所誤。

報導方面的問題

報章新聞往往被誤認為是客觀而全面的，許多報章也樂得以此為標榜，但本港不同報章的不同表現，正好否定了這種看法。

(一) 立場的表現

——打破客觀報導的神話

在香港這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我們可以閱讀各種不同立場的報章——有政治立場鮮明的，也有標榜客觀中立的。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新聞價值取向，必然影響個別報章對於同類新聞的處理方式，包括消息的選擇及表現的形式。新聞報導其實包涵了編輯對於事件的詮釋甚至評論，或者他的新聞價值觀，只是明顯程度的分別吧了。

92

(1) 新聞的選擇

本港報章的國際新聞主要來自外國的通訊社。但外國的消息非常多，國際版的篇幅卻很有限，所以前者必須經過編輯的選擇；選擇必然有標準，那便是新聞的價值觀。對於這次波蘭事件，一般報章都大量「選登」有關的新聞，並往往以頭條來報導，顯示出普遍的重視態度。另一方面，只要比較同日不同報章刊登的有關新聞，便可以見其選擇性。例如12月18日〈東方日報〉有以「蘇聯駐捷克部隊——向波蘭邊境推進」及「波償外債拖欠利息——要求外國銀行貸款」等為題的新聞，都是同日〈晶報〉國際版（篇幅相若）所無的；1月19日〈中報〉有「美與北約日本會談——討論制裁蘇聯問題」

的消息，〈東方〉沒有，後者有「波副總理又大放關詞——解除軍法波將大亂」的新聞，又是前者所無的。

一些「中立客觀」的報章，其實已從有關消息的選擇中，表現了既有的價值取向，例如〈信報〉和〈工商晚報〉的經濟取向。

(2) 表現的形式

消息的版面位置 標題的「搶眼」程度、標題的內容等，都表現編輯對事件的理解和態度。本港右派的報章，在高度重視該事件的同時，更明顯地在標題裏表現既有的政治立場：

列根比喻波局為「共產思想破產」(12月19日〈工商日報〉)

93

抵維也納旅客証實
波礦工抗暴
十二人犧牲(十二月三十一日〈星島日報〉)

不堪軍管高壓政策迫害
波蘭共產人員脫黨
拋棄黨証垃圾成籮(十二月三十一日〈華僑日報〉)

加上對於其他類似例子的認識，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背後支持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一貫立場和以美國為主持正義者的理解。但主要矛盾是否真的來自「共產黨」和人民的必然對立？美國（列根）是否真的或純粹的正義主持者（還是爭霸者）？

相較之下，一般左派報章的報導便顯然中立得多了：

格坦斯克四萬工人

會與軍隊坦克衝突 (十二月廿四日〈大公〉)

官方強調軍管之暫時性

波局勢昨平靜 (十二月十五日〈文匯〉)

這些報導沒有明顯地站在人民一邊；大概是受了北京「迄今仍客觀地報導，沒有評論」(12月22日〈晶報〉)所表現的態度影响吧。

(二)報導的貧乏性

94

廣泛閱讀過不同報章對波蘭事件的報導後，我們會發現兩個普遍的性質：「片段地」和「片面性」。在同日的報導裏，我們往往難以找到各段消息的相關性；不同日子的報導之間，也很少顯得出連貫性的。我們閱讀所得的只是些片段的、平面的消息，不能表現事件各種因素的互動和歷史性，也難以啓發我們作更深入的思考、反省。這固然是篇幅、編輯運作等因素的結果；但大陸〈光明日報〉等「整合」的報導方式(將相關的消息有秩序地並置，表現其間因果性及連貫性)，顯示了這種做法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多數報章的報導，都偏重這次事件的「國際」性，特別注意國際反應，例如美蘇領導人的發言等。至於軍法統治後工運的情況，國內國外的「民間」反應(抗議軍法統治的示威遊行)等，則少見報導。即使在軍法統治之前，國內情況的消息來源也往往限於工會領導人或官方。可能的原因是：(1)資料來源的局限，例如軍法當局封鎖對外通訊；(2)新聞界(包括外國通訊社)流行的價值取向的影响—以為有「國際影響」才與本地有關或才有重大意義的心理；(3)迎合讀者與(2)類似的的要求。

評論方面的問題

一般報章會以「社論」或特稿等形式，對於重要事件作出分析及評論。這類文章在立場的表達方面更為直接，對讀者的影響也往往更大。

就波蘭事件而言，一般報章的評論都是站在人民的一邊的。也有很多報章注重這次事件的國際性，以為是外力干預的結果，並耽心它會影響國際局勢。另一方面，波蘭社會的內部動力，目前政經制度的具體弊端、歷史的因素等，便普遍忽略了。

左派的報章，可能是受大陸影響，整體的反應並不強烈，多以譯稿接觸這次事件；評論的態度也傾向於「客觀冷靜」。受到強調的是：這次事件是波蘭內政，不容外力干涉；希望官民協商、軍民同心，和平解決這個內部問題（〈文匯〉12月14日及16日「社論」、20日「編餘漫筆」，〈大公〉19日及21日「縱橫談」，〈晶報〉22日社論）。有些評論比較全面和立體，國內及國外的因素都能顧及（尤以〈文匯〉為然）；也有能在敏感問題上表態的（〈文匯〉12月27日社論談過：軍事手段難以阻止「社會民主改革的歷史要求」和「波蘭問題的真正解決」在於「徹底的社會改革」；〈晶報〉22日：「但鎮壓工人是大錯誤。」）。但是，不少的評論仍嫌片面（〈大公〉、〈晶報〉只看到波蘭軍隊的動向）或立場模糊（例如〈大公〉）。此外，有一種論點是特別需要澄清或修正的：所謂「不容外力干涉」，該是指「損害人民的干涉」；真正的問題在於「干涉者」的立場和態度。我們反對蘇聯直接（出兵）或者間接（唆使或支持軍法統治）的干涉，却讚許國外各種對波蘭人民的支援（工人示威、宗教團體組團入波蘭調查等）。

右派報章的社論是更明顯地站在人民一邊的；也如本身的新聞標題一樣，常常應用一些感情涵義豐富的字眼表示對統治階級的反對態度（例如〈星島日報〉12月21日社論中的「黨棍官僚集團」）。但在不少同類報章裏，這種態度往往建基於以下的理解：這次事件是共黨和人民必然矛盾的結果；而且波蘭的軍隊，「正像任何其他共產國家的武裝部隊一樣，是受共產黨的教養，聽共產黨指揮，替共產黨撐腰，為共產黨拚命的軍事力量。」（〈工商〉12月18日「社論」）一個「任何其他」和一連串的排句，突出了多數右派報章所執着的二分世界論（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對立）。在這種高度簡化的觀點下，「共產制度」＝極權政治，「共產黨」＝人民的死敵；於是他們看不到所謂「共產世界」，其實是由「不同」的共產國家，「不同」的共產黨和分歧相當大的「共產思想」所組成的，更不會懷疑上述兩個方程式背後的邏輯。很諷刺地，現在更為專制，壓迫人民更甚的統治階層，正是「篡黨奪權」，本身不很「共產主義」的軍人集團。

「客觀」的外衣，掩飾不了一些中立報章既有的價值取向。〈明報〉和〈信報〉的經濟取向便很明顯。〈明報〉的「社論」很關注波蘭危機的經濟因素和經濟後果：「…而關鍵所在的經濟衰落，只有更加惡化」，「波共的鎮壓行動可以成功，經濟困難不能解決」（12月14日）；「波共當局儘管奇兵突出，鎮壓成功，但而對千千萬萬含有敵意的工人，經濟困難終究無法克服。」（15日）。此外，該報的論述便集中於工會急進策略的錯誤。〈信報〉15日的「政經短評」則更清楚表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於是「波蘭問題就十分簡單」了：

波蘭是福利國，工人要求更多的免費午餐的同時又不能提高生產力……在一黨專政和實行

不能刺激生產力的經濟制度而導致百物匱乏的波蘭，政府即使有意滿足工人改善物質條件的要求，亦感有心無力。而當工人的要求無法被接納時，政經問題頻生是意料中事。

從上述的角度看，「波蘭事件有二點我們特別關注的事——第一、波蘭欠下西方國家二百五十億美元的債務」，所以「短評」希望華里沙和天主教會「能成功地調和政府與工人間的矛盾，不致讓事件鬧大；蘇聯坦克一旦從邊境開入，西方銀行借出的款項的償還日子就遙遙無期了。」第二點是：「前波共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亦被捕，說明他已成為經濟失敗的代罪羔羊」。在使用上述「角度」之前，「短評」也有提過工會的政治要求及外力干預的因素，在但編者的眼中，顯然不是「問題的核心」了。我們不能說上述兩報的評論錯誤，但不能不指出它們觀點的偏狹——它們忽略了政治制度、政府的親蘇政策，人民在幾次政治運動後經驗及醒覺性的累積等許多重要因素；而當波蘭人民再次陷入深重的苦難的時候，〈信報〉只見經濟不見人的評論似乎過於「冷靜」了。〈信報〉值得欣賞的地方，是其他形式的資料或論析較多。

97

結論

新聞的報導或評論，都不能、也不應完全客觀或中立的。新聞報導及評論的任務，除了使讀者「知道」某件事的發生外，更要進一步透過理性和感性的衝激，發揮「教育」的功能——一方面盡量提高消息的全面性及連貫性，加上多角度的分析，另一方面又要表明態度和立場，俾能深化讀者對於事件的了解，並刺激讀者對於事件的「感受」、反省以至對於人類社會的關心。